

中華衛藏：清仁宗西巡五臺山研究

林士鉉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提 要

清朝前期的帝王巡幸是極為重要的官方活動。康熙、乾隆時代頻繁地北巡至承德避暑山莊，進行秋獮圍獵，並多次舉行東巡盛京、南巡江浙、西巡五臺山，這些巡幸持續至十九世紀初。透過籌辦巡幸，帝王省方問俗，崇文習武，展現了滿洲皇權的實力，同時能夠聯繫藩部，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形塑清王朝的獨特性格。

山西五臺山位處蒙、漢邊界，並存著漢、藏佛教形式，尤其吸引蒙古人前往朝拜，透過清帝西巡，將其地位推向高峰。「中華衛藏」即是清仁宗定義下的五臺山。然而所謂的西巡尚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清仁宗嘉慶帝親政之後，清朝正式進入「後乾隆時代」。乾隆朝所建立的典章規制成為仁宗遵奉的基本原則，巡幸活動亦不例外，除了南巡，均勉力奉行。

清仁宗十分重視嘉慶十六年的西巡，謹慎籌畫多年，然而由於時空環境、經費條件的不同，以及君王與官僚在籌辦認知上的差距，此次西巡展現出與前朝不同的特殊性與局限性，其結果是清朝往後未再舉辦西巡。

本文即針對仁宗所舉行的唯一一次，也是清朝最後一次的西巡五臺山進行考察，主要利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五臺圍檔·嘉慶十六年》，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等原始史料，參酌嘉慶朝特為此次巡幸五臺所敕修的《西巡盛典》，除分析其籌辦始末，亦論及宗教因素的特殊作用。

關鍵詞：清朝、清仁宗、五臺山、西巡、嘉慶、乾隆、滿洲

前 言

「中華衛藏」出自清仁宗於嘉慶十六年（1811）西巡五臺山之後所做〈清涼山記〉一文，衛藏，即西藏的別稱。¹為何五臺山在清代中葉具有如同衛藏一般的地位，有其特殊原因。盛清時期康熙、乾隆年間清帝多次西巡五臺山，成為與南巡江浙、北巡盛京同樣重要意義的政治文化活動。西巡特別之處在於目的地性質不同，由於五臺山是一個漢藏佛教並存的佛教勝地，因此西巡所表現的政治文化活動，反映了清朝政權的宗教性質。

清仁宗於嘉慶九年川陝楚教亂平定後，方能舉行大規模的巡幸活動。嘉慶十六年西巡五臺山，不但是其唯一一次，也是清朝最後一次帝王西巡。分析此次西巡的史料與活動特色，除了可深入了解事件本身之外，亦是探討巡幸活動與清朝政治文化關係不可或缺的一環。

清朝重視五臺山或許和清世祖順治帝出家的傳說有關，尤其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聖祖奉太皇太后西巡五臺山之舉，孝莊太后與順治帝的母子關係引人連想；然而學界多半不認同此說，僅列為疑案。²尤其就強化統治意識形態而言，此傳說並無明顯作用，五臺山若有何政治文化意義，必須透過西巡相關檔案、官書史料，具體分析活動始末，方能有效理解具有宗教性質的西巡活動的內在意涵。然而，康熙、乾隆年間的巡幸活動已引起較多的關注，清仁宗於嘉慶四年親政後即舉辦木蘭秋獮，東巡盛京，³唯巡幸五臺山卻仍然少有論著。⁴

1 衛藏乃清初地名，元、明代稱「烏思藏」，松筠著《衛藏通志》，卷三，山川，頁202。衛，藏語 dbus 的音譯，指以拉薩為中心之地，元、明時多譯作烏思；藏，藏語 gtsang 的音譯，指以日喀則為中心之地，或譯為後藏。

2 陳捷先，《順治寫真》，頁270-276。

3 清仁宗的巡幸活動亦頻繁，幾乎十年前往承德避暑山莊，舉行秋獮十一次（嘉慶七、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另於嘉慶十年、二十三年，兩次東巡謁陵，參見朱誠如、張玉芬主編，《清朝通史·嘉慶朝》，頁354-382。

4 關於清仁宗的主要傳記著作，肖雨，〈嘉慶皇帝與五臺山〉，《五臺山研究》（1995：1），頁24-25有簡單描述；又如：關文發，《嘉慶帝》，書中沒有探討清仁宗的巡幸活動；朱誠如、張玉芬主編，《清朝通史·嘉慶朝》介紹了木蘭秋獮及東巡謁陵，但沒有提及西巡五臺山一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五臺山文獻頗為豐富，包括宮中檔、軍機處檔摺件，以及《五臺圍檔·嘉慶十六年》檔冊；院藏善本圖書方面，除了清乾隆年間內府朱絲欄寫本《欽定清涼山志》二十二卷，還有嘉慶年間敕命刊行的《西巡盛典》二十四卷、增纂《欽定清涼山志》二十二卷，外界並不多見；⁵本文亦使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央研究院《內閣大庫檔案》等已刊、未刊檔案分析此次西巡的特色。

一、清政權與五臺山

（一）五臺山：地理與佛教

五臺山位於山西北部代州，三面臨界長城，東界直隸，外接蒙古地方，地理位置特殊。《欽定大清一統志》簡述代州形勢：「三面臨邊最稱險要」、「天下九寨雁門關為首」，「雁門障其西北，滹沱經於東南」；⁶而五臺山位於代州五臺縣境內，又名「清涼山」，歷來地志、佛傳多有描述，《欽定大清一統志》亦略說：

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水經注》：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史炤《通鑑注》：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元和志》、《道經》以為紫府山皆即此山也，山左鄰恒山，右接天池，環基五百餘里，五峯聳立，高出雲表，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其名五臺以此。

這裡指出五臺、清涼之名乃得自地形及氣候。可見五臺山除了地點接近文化邊界，其地形與氣候亦十分特殊。

五臺山因五座臺頂得名，其南臺坐落在五臺縣境，餘四臺跨入繁峙、代縣及河北阜平境內。五臺山的範圍古今說法不同，地理位置約在東經 113.29 至 113.39 度，北

5 清高宗敕修《欽定清涼山志》內容止於乾隆五十年，刊本見《續修四庫全書》，冊 722；及《故宮珍本叢刊》，冊 248。《西巡盛典》清刊本參閱（清）董誥、彭齡等輯。

6 《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一百十四，代州，頁 6-7。文中引據馬端臨《文獻通考》、王象之《輿地記》等著作。

緯 38.55 至 39.66 度之間，東西約十六公里，南北約二十一公里，總面積為三百二十平方公里。整體山勢呈五瓣蓮花狀，以臺懷鎮為最低處，海拔一千七百公尺各臺峰距臺懷鎮距離不等，約十五至二十五公里之間。⁷《欽定大清會典圖》山西省全圖繪入五臺山周邊形勢，圖中標示清涼山，參見圖 1；《內府輿圖》中清楚可見五臺山臨界長城及各處關口，參見圖 2。

佛教於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約於五胡十六國時期（304-349）百餘年間在中國北方迅速傳播，亦傳入山西地區。《華嚴經》提到了清涼山是文殊菩薩講經說法之道場，此後為各地信徒所深信，形成文殊信仰中心；自元朝開始，藏傳佛教漸盛，歷經明清，成為漢藏佛教並存的佛教勝地。⁸著名的寺院包括：臺懷鎮的大顯通寺，相傳始建於漢明帝時；大文殊寺，即菩薩頂真容院，為唐僧法雲創建；大寶塔院寺，傳說有佛舍利及文殊髮塔；圓照寺、廣宗寺、望海寺、普濟寺等等上百座寺院成群，具載於歷代各種清涼山志書。⁹寺院分佈略圖，參見圖 3。

清代乾隆年間敕修《欽定清涼山志》，詞臣比較五臺山與其他佛教聖地，凸顯了五臺山的地位：

清涼山屹神京之右襟帶，幽燕頡頏恒嶽，自昔與普陀、峨嵋並稱為三大士道場，而二山者，或境遠不可即，或道險未易登。惟清涼近接都邑，以故皈依者多往遊焉。¹⁰

五臺山與普陀山、峨嵋山並稱三大菩薩道場，其中清涼山雖近邊界，因近於元代以來的政治中心——北京，更能吸引信眾前往。

（二）清帝西巡

清朝入關後政局尚未穩定，西北軍事頻仍。順治年間，山西一帶清廷並未能有效

7 崔正森，《五臺山佛教史》，頁 1-16。北臺葉斗峰距臺懷鎮 15 里，西臺掛月峰距臺懷 25 里，南臺錦峰距臺懷鎮 15 里，中臺翠岩峰距臺懷鎮 20 公里，東臺望海峰，距臺懷鎮 15 公里。

8 崔正森，《五臺山佛教史》，頁 74-110、541-561。

9 除各種清涼山志書外，五臺山寺觀簡述另見（清）王軒等修《山西通志》，卷五十七，古蹟考八，寺觀，頁 4113-4124。

10 《欽定清涼山志》（故宮珍本叢刊本），卷九，頁 17a。

控制；¹¹順治十二年（1655）夏季以前，五臺山地區尚有悍民盜賊盤據、盜開銀礦之事。¹²清朝開始注意五臺山的聖山意義，舉行朝禮儀式，當自順治十二年，清世祖派遣大臣及喇嘛到五臺山朝禮、頒賞及獻供。¹³

康熙年間，清聖祖除了五度親往五臺山，又在明代《清涼山志》的基礎，增纂《清涼山新志》十卷，於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初三日撰寫御製序文，將此志書譯成滿、蒙、藏文刊行。¹⁴乾隆五十年（1785），奉諭纂修《欽定清涼山志》；¹⁵此志復於嘉慶十六年增纂，¹⁶且將是年巡幸五臺山之行纂成《西巡盛典》。

清帝曾舉行過十二次西巡：聖祖於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及九月、三十七年二月、四十一年二月、四十九年二月，五次西巡五臺山；高宗於乾隆十一年九月、十五年二月、二十六年二月、四十六年二月、五十一年二月、五十七年三月，六次西巡五臺山；後來僅有嘉慶十六年三月最後一次的清仁宗西巡。歷次西巡重要時程參見表一。

由於清高宗承先啓後地實踐巡幸傳統，充分展示了清朝前期具有滿洲統治特色的政治文化風格，仁宗亦不自外於此政治文化傳統，其北巡、西巡亦能遵奉前例，唯無南巡之舉。¹⁷

11 直至順治十二年夏季，清軍始平除自明末以來山西南部一帶的盜匪勢力，參見魏斐德，《洪業》，下冊，頁 970-976。

12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85048-015、006203-001、038657-001、037533-001、037274-001、006118-001。

13 王俊中，《五世達賴教政權力的崛起》，頁 21、267-270。文中指出順治年間清廷重視五臺山與順治十年五世達賴來訪北京有關。

14 （清）喇嘛老藏丹巴，《清涼山新志》（故宮珍本叢刊本），〈御製序〉，頁 1-5。另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漢、滿、蒙、藏文本，清武英殿刊本。

15 《欽定清涼山志》，二十二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內府朱絲欄寫本。卷首，〈上諭〉，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初三日。

16 《欽定清涼山志》，二十二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17 關於清朝舉行南巡的意義，及清仁宗時期未辦南巡的可能性，參見 Michael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pp.425-438.

表一 清聖祖、清高宗西巡重要時程一覽表

	年代	起鑾日期地點	回鑾日期地點	回京日期地點	備註
1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1683）	二月十二日 甲申	二月二十四日 丙申（菩薩頂）	三月六日 戊申	皇太子胤礽隨駕
2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1683）	九月十一日 己卯	九月二十七日 乙未（菩薩頂）	十月初九日 丙午	奉太皇太后朝山
3	康熙三十七年 戊寅（1698）	正月二十七日 癸卯	二月十一日 丙辰（菩薩頂）	二月二十二日 丁卯（暢春園）	皇長子胤禔、皇三子胤祉隨駕
4	康熙四十一年 壬午（1702）	正月二十八日 庚戌（暢春園）	二月十三日 乙丑（菩薩頂）	二月二十九日 辛巳（暢春園）	皇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禛、皇十三子胤祥隨駕
5	康熙四十九年 庚寅（1710）	二月初二日 丁酉	二月十七日 壬子（白雲寺）	三月初五日 庚午（暢春園）	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八子胤禩、皇十子胤禔、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隨駕
1	乾隆十一年 丙寅（1746）	九月初十日 癸卯（靜宜園）	九月二十七日 庚申（菩薩頂大營）	十月十六日 戊寅	奉皇太后朝山；謁泰陵
2	乾隆十五年 庚午（1750）	二月初二日 乙亥	二月十六日 己丑（菩薩頂大營）	三月六日 己酉	奉皇太后朝山
3	乾隆二十六年 辛巳（1761）	二月初十日 庚辰（圓明園）	二月二十八日 戊戌 ¹⁸ （菩薩頂行宮）	三月十七日 丙辰 ¹⁹ （暢春園）	奉皇太后朝山；謁泰陵
4	乾隆四十六年 辛丑（1781）	二月二十二日 乙丑（圓明園）	三月十二日 乙酉（白雲寺行宮）	三月二十七日 庚子（圓明園）	
5	乾隆五十一年 丙午（1786）	二月十八日 壬辰	三月初八日 壬子（白雲寺行宮）	三月二十六日 庚午（圓明園）	謁泰陵、泰東陵；三月十一日乙卯，孝賢皇后忌辰，上命皇十五子顥琰祭陵寢
6	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1792）	三月八日 丁丑	三月二十八日 丁酉（白雲寺行宮）	四月十六日 甲寅（圓明園）	謁泰陵、泰東陵

資料來源：《清實錄》、《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所藏）》、《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所藏）》、《乾隆帝起居注》、《起居注冊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三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滿文本清聖祖起居注稿康熙四十九年三月份》（中央研究院內閣大庫檔），參見圖版4。

資料說明：1. 起鑾、回鑾之地點，據《清實錄》、《起居注冊》所載，皇宮以外即另行標示。2. 若干年份並未注明回鑾日期，本表以離開五臺山境內最後駐蹕地方行宮之次日為度。3. 《起居注冊》康熙四十九年二月份，查滿、漢文定本、稿本均無存，日期據其他史料推斷。

18 《清實錄》未寫明回鑾字樣。

19 此日，《清實錄》寫做「丙辰上回鑾奉皇太后居暢春園」。

（三）蒙古朝拜五臺山

在清仁宗西巡之前，蒙古僧人不遠千里朝拜五臺山的現象確實存在，朝拜五臺山並非只有清代皇帝關注，蒙古王公、喇嘛亦相當重視。嘉慶九年七月，科布多參贊大臣恒栢（Hengbe）奏報所管厄魯特委達喇嘛，羅布桑吹木丕勒（Lobsangcoimbil）等十四人，欲往五臺山朝拜呈請兵部給發路引；除照例發給並行文知照綏遠將軍、山西巡撫。²⁰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恒栢復奏報當地依拉古克三呼圖克圖（Ilgüksen Kütuktu），帶領子弟喇嘛五人欲前往五臺山朝拜，請給發路引。²¹嘉慶十一年十二月，陝甘總督長齡奏報地方刑案，於肅州盤獲喇嘛供稱同赴五臺山叩見活佛。²²

清代中後期蒙古朝拜現象亦能於檔案中反映出。道光十七年（1837）五月，科布多參贊大臣毓書（Ioišu）奏報杜爾伯特副盟長貝子策凌多爾濟（Cerindorji）呈稱，該旗達喇嘛津巴章（Jimbašang）等十人欲前往五臺山朝拜肯請給發路引。²³道光三十年九月，科布多參贊大臣慧成（Huiceng）奏稱，杜爾伯特盟長親王貢布扎布（Gombujab）因無子嗣，故帶領下屬二十五人朝拜五臺山，佈施行善以求子嗣，欲從殺虎口進出，懇請發給路引。²⁴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科布多參贊大臣寶昌奏報，據杜爾伯特左翼署盟長達賴汗噶勒章那木濟勒（G'aljangnamjil）呈稱，其福晉、親生諸子所領喇嘛喀拉（Kara）等十七人朝拜五臺山，請給發路引。²⁵

清朝政府纂修《理藩院則例》以規範藩部事務，上述科布多參贊大臣所轄蒙古部眾共十九旗，即包括左、右翼各旗杜爾伯特。²⁶據《理藩院則例》規定，內外扎薩克蒙古等，只准由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進出，且邊門章京須查明證記，其餘邊門一概不准通行；至於蒙古王公朝拜五臺山的規定，尤其明確：「王公將所帶跟役人數，并由何口行走及經過地方呈明該盟長，聲明報院核辦；

20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63473-001，移會，嘉慶九年七月十七日奉硃批（滿文）。

21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225554-001，移會，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奉硃批（滿文）。

22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48632-001，移會，嘉慶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硃批。

23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88697-001，移會，道光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奉硃批（滿文）。

24 《軍機處檔摺件》（奏摺副錄），文獻編號 174683，奏為杜爾伯特王公五臺山請路引由（滿文），道光三十年九月初一日具奏。

25 《軍機處檔摺件》（奏摺副錄），文獻編號 173629，奏為噶勒章那木濟勒之福晉等叩謁五台山請給路引由（滿文），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具奏。

26 （清）理藩院修，楊選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卷一，旗分，頁 63。

咨行兵部給與路引，回旗後，原領路引送院，咨送兵部查銷」。²⁷上述杜爾伯特盟長無論派遣喇嘛或福晉入關朝拜，即須符合理藩院定例。至於蒙古喇嘛欲出境亦規定：「蒙古喇嘛則於各該管官名下就近給發票據，并移咨交界各旗，按月派員巡查，不准私自出境」。²⁸

總之，蒙古人爲朝拜五臺山而請領路引入關，成爲蒙古地方與中央理藩院經常處理的重要業務，明載於則例之中。

二、清仁宗西巡之緣起

（一）皇子時期

清仁宗於皇子時期曾從父親謁陵並西巡五臺山，亦留有詩作，唯隨從確切次數，目前史料尚不足明說。曾作〈月額雨〉一詩內有「巡旌駐臺懷」之句，²⁹「臺懷」是行宮之名，而詩末註有「三月朔日上駐蹕五臺」，比對詩集年份及《清實錄》等官書記載，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三月朔日，確實駐蹕白雲寺行宮，可知當時曾隨從高宗西巡。³⁰乾隆五十七年，清高宗西巡途中，於三月十三日命皇十五子嘉親王祭泰東陵，嘉親王即日後的仁宗嘉慶皇帝，此年是否亦扈隨至五臺山則尚待其他史料佐證。³¹

（二）預備西巡

清仁宗除了於皇子時期曾隨侍扈從之外，登基之後，關於山西五臺山的任何訊息

27 《理藩院則例》，卷三十四，邊禁，〈稽查出入邊門〉、〈五臺山進香給與路引〉，頁 296。

28 《理藩院則例》，卷三十四，邊禁，〈蒙古喇嘛等出境請領票據〉，頁 303。

29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故宮珍本叢刊，冊 579），卷二十一，詩，頁 11b-12a，〈月額雨〉：「好雨喜知時，恰當三月額，春耕正及茲，滋潤透阡陌。濃陰已連朝，朔夜霏微積，松簷戛細音，竹院涵清液。應欣可催花，尤喜能助麥，寒食前半旬，郊野增新碧。巡旌駐臺懷，能仁施利益，法雨注十方，佛澤承帝澤。」其後尚有〈五臺詠勝〉五首，頁 12a-13a。

30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二五〇，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三月上乙巳朔。

31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九八，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上辛巳。

均十分重視。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山西北部大雨成災，五臺山山水漲發，道旁廟宇已有沖毀；隨後幾年，每遇雨水連綿，兼有山風猛烈，受創嚴重；嘉慶二年，據山西巡撫蔣兆奎奏報，廟宇損壞已有十二處之多，整修所需工料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四分八厘。³²

嘉慶六年夏，水災再度重創五臺山地區。據嘉慶七年四月初七日山西巡撫伯麟所奏，殿宇房間坍塌，地址下陷，牆垣岸堤被沖壞者，有普樂院、菩薩頂、廣宗寺等十七處；而滲漏損壞，尚可緩修者，亦有臺麓寺、金燈寺、明月池、殊像寺等九處。³³越明年，伯麟復奏稱：臺山天候寒冷，每年僅四、五、六、七等月可動工施作，應自臺山生息銀內動支，先行購料修築地基，其後奉旨妥辦。此次修整工程頗費時辰，於嘉慶九年二月方修理完竣。³⁴

經過嘉慶七年至九年的整修，五臺山各寺院應已得到較完整的保存，煥然一新，這也引起了仁宗巡幸五臺山的興趣。仁宗欲舉辦西巡的想法並未立即公開，僅山西巡撫、軍機大臣等少數人得知，我們透過君臣間奏摺、密諭的互動，可略知其間考量。

山西巡撫伯麟曾奉傳旨：「（嘉慶十年）或臨幸五臺山不定，今暗中預備」，是故伯麟趕緊勘查五臺山各處行宮情形，之後便奏報查勘五臺山行宮尖營情形，行宮、尖營位於平衍地面，因被水嚴重，聖駕駐蹕重地必須重建或移建；³⁵仁宗批覽之後，便取消近期内舉辦西巡的想法，從寄信上諭可知：

嘉慶九年四月十三日奉上諭：伯麟等密奏查勘五臺山行宮、尖營情形分別辦理一摺，前因該撫等奏晉五臺山各廟工俱已修理完整，朕意各寺廟業經見新，或於一、二年內巡幸五臺，拈香廟宇可無須復行修飾，曾諭令該撫

32 〈山西巡撫蔣兆奎為請修葺五臺山廟宇事奏摺〉，嘉慶二年閏六月初五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37-38。

33 〈山西巡撫伯麟為勘明五臺山急修緩修各廟工分籌辦事奏摺〉，嘉慶七年四月初七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39。另見《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150287-001，戶部為查修五臺山普樂院等處事，嘉慶七年四月。

34 〈山西巡撫伯麟為五臺山廟工修理完竣及請修五臺山行宮事奏摺〉，嘉慶九年二月十八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40-41。

35 〈山西巡撫伯麟為查勘五臺山行宮被水沖損情形奏摺〉，嘉慶九年四月初七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41。據奏報所稱除可了解受災情況，亦能看出行宮規模。

等酌量預備，旋於摺內批諭，如實有難辦之處，據實具奏，即再遲數年亦可。……此事原非不可緩，既據該撫等查明工程較大，所有原擬明年巡幸之舉即著停止，其一切工程俱著緩為修理，該省庫貯閒款前經湊撥各省急需，俟數年內逐漸歸款充裕，再將各處工程妥協辦理，惟當遵照舊式修理完整，務從簡樸，不准踵事增華……。³⁶

由此可知，行宮、尖營一時之間無款修繕，是西巡不能進行的重要原因，行宮是皇帝行旅期間的重要居所，而尖營是臨時休息站、中伙處，滿語稱做烏墩（uden）。³⁷由此諭亦可知，山西一省庫貯不足情況，至嘉慶九年仍十分嚴重。

西巡之路必先經過直隸南部。嘉慶九年四月，仁宗亦曾令直隸總督顏檢勘明畿南一帶行宮、座落情形，據稱：「行宮六處尚多完整，惟座落十處多有傾圮，又道路有須修治之處」；然而山西行宮只能等待他日籌款修繕，直隸境內之行宮、座落亦無須急於一時，未勘查之新城縣紫泉行宮亦不必再前往勘查。³⁸仁宗於此諭中同樣指出「巡幸五臺原非必不可緩之事」，語氣中頗感無奈。

但是仁宗並未放棄西巡的想法。嘉慶九年八月，護理山西巡撫張師誠奏報，為續修五臺山廟宇估需工料銀兩事，摺內聲稱欲將前請緩修之臺麓寺、金燈寺、金閣寺等九處，及中、西、東、北四臺頂廟宇重修，即奉硃批：「依議速辦」。³⁹

總之，清仁宗至遲於嘉慶九年春即表示希望嘉慶十、十一年能舉辦西巡，並且積極了解各廟宇修整情況，卻因山西省嘉慶九年發生天災，收成稍歉，又值直隸本年正籌辦「盛京差務」，無法顧及五臺蹕路一切行宮頓宿及道路橋樑等項目，只好宣諭將嘉慶十一年春五臺差務暫緩辦理，一切工程均「候旨辦理，暫可停工。」⁴⁰

然而停工不久，新任山西巡撫成寧認為，次年皇上五十萬壽將屆，乃繼續勘查施

36 〈山西巡撫伯麟為查勘五臺山行宮被水沖損情形奏摺〉，嘉慶九年四月初七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41-42；另見《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9，頁125。

37 （清）趙翼，《簞曝雜記》，卷一，頁22-23，〈軍機撰擬之速〉。

38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9，頁126-127。

39 〈護理山西巡撫張師誠為續修五臺山廟宇估需工料銀兩事奏摺〉，嘉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42。

40 〈山西巡撫同興為遵旨查明五臺山應修應緩工程事奏摺〉，嘉慶十年二月十五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42-43。

工，以期聖駕臨幸。嘉慶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成寧便奏報勘明五臺山工程，道路應行修辦，並指出廟宇、行宮、尖營經前撫臣伯麟籌項修葺尚未完竣，有購貯物料而未經興工者，所費尚不甚大；而道路自長城嶺直隸交界處起，至臺懷正道及各處岔道、橋座因歷年山水漲發，多被沖刷塌陷，亦有沙石壅積情形，應逐段加工，修整寬平。此摺特別提出，嘉慶十四年，「恭逢皇上五十萬壽，得邀翠華臨幸，斂福錫民，輿情實為歡躍，瞻就之忱尤切，修辦自不可緩。」⁴¹

當時山西巡撫成寧亦曾奏報本年夏麥有收，秋稼登晉較上年更為豐稔，擬於次年，即嘉慶十三年「新正諏吉」，舉辦西巡，奉硃批：「此事可緩，候旨再辦。」⁴²至此可知，清仁宗雖有意圖西巡，然而決定時機未到，可謂一延再延，十分慎重。

（三）再議西巡

嘉慶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寧奉到寄信上諭，由內容可知舉辦西巡最初的時間已預訂於嘉慶十四年五旬萬壽之時，然而後來中止乃因有直隸方面的考量。蹕路於山西境內僅一百餘里及行宮一處，而直隸境內，自京師至長城嶺一帶，有一千餘里，道路綿長，尤其明天春巡幸天津之事已定，若秋冬間再令預備五臺相關之差，恐力有未逮。因此，又將原定嘉慶十四年西巡之處停止辦理，緩至十六、七年間。⁴³

山西農作收成情形亦影響西巡。嘉慶十三年二月，欽差光祿寺卿錢楷等赴山西審辦控案，亦向成寧轉傳面奉諭旨，初步決定於嘉慶十五、十六兩年內臨幸，令成寧察看情形、斟酌奏請。這表示將西巡舉辦與否的決定權交於山西巡撫。成寧奏報已將從前運到物料，進行擇要修葺，唯必須於本年秋成，察看年歲情形之後，再以密摺請示臨幸定期。⁴⁴成寧復於十三年八月初三日具摺奏報秋禾約收分數，山西省九府十直隸州所屬各廳州縣，及歸綏道所屬各廳，通省秋禾約收八分，仁宗對此預測感

41 〈山西巡撫成寧為勘明五臺山工程道路應行修辦事奏摺〉，嘉慶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43-44。

42 〈山西巡撫成寧為勘明五臺山各處工程修葺奏片〉，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44。

43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404009648，嘉慶十三年正月初二日，成寧奏摺。

44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404010114，嘉慶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成寧奏摺。

到滿意。⁴⁵

遲至嘉慶十四年二月間，已預期將於嘉慶十六年臨幸五臺山。山西巡撫成寧與直隸總督溫承惠，亦計畫在十四年四月中旬於兩省交界之龍泉關會商，並查催各處工程。⁴⁶嘉慶十四年四月，直隸總督溫承惠至五臺山區勘查，於十八日行抵臺麓寺。溫承惠將面奉諭旨宣述於晉撫成寧，強調修葺以「崇樸黜華、節省浮費」為原則；二人會同詳細查勘，並奏報所有工程於明年秋間當可一律全竣。⁴⁷成寧於勘查後，亦奏報工程修辦已有四成，由硃批內容可看出仁宗對晉撫辦理西巡的疑慮：「朕惟崇節儉不喜浮靡，汝若不能體會，仍以逢迎餽送為見長，彼時即治汝罪，決不輕恕，慎之，戒之。」⁴⁸

（四）公佈西巡

嘉慶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諭山西巡撫初彭齡，據其所奏五臺山工程已完成十分之四，明年七八月可完工，諭曰：「朕擬于十六年三月下旬諏吉啓蹕，臨蒞拈香，於常雩大祀以前回鑾。」並且要初彭齡詳查乾隆年間清高宗臨幸五臺山時，「曾否由該處地方官籲請，即先行具奏，若從前係特降諭旨臨蒞，亦即查明具奏。」⁴⁹據此，嘉慶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初彭齡接旨奏覆：

惟查乾隆二十六年、四十六年、五十一年、五十七年等年，俱係特降諭旨，前撫臣等曾否具摺奏請，雖現無文卷可查，但臣體察民情，實深望幸，自當俯順輿懷，恭摺吁請，容俟同綏遠將軍臣來儀、學政臣黃鉞、大同鎮總兵臣王模、太原鎮總兵臣烏爾滾阿等合詞具奏……。（硃批）覽。⁵⁰

45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11684，嘉慶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成寧奏摺。

46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13769，嘉慶無年月，此奏片載明著手預備嘉慶十六年之西巡各項工程，並於此次赴省北閱兵後，將於四月中旬與直督溫承惠會商；另據編號 404013375，嘉慶十四年二月十八日，成寧奏報前往省北查閱營伍日期，可知此奏片日期約在嘉慶十四年二月至四月中旬之間。

47 〈直隸總督溫承惠為將修葺五臺山工程諭旨宣述成寧事片〉，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 44。

48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14078，無年月。

49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4，頁 697-698。

50 〈山西巡撫初彭齡為遵旨飭查山西各行宮尖營廟宇工程等事奏摺〉，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下）〉，《歷史檔案》，84(2001.4)，頁 26。

清仁宗考量公開西巡的形式，是自己特諭或是應有地方官員邀幸，令晉撫查明前例；初彭齡顯然把握時機，表示將聯合地方要員籲請西巡。次年三月二十二日，由內閣發佈上諭，公佈西巡計畫：「朕前此俯允晉省士民之請，於明年三月內親詣五臺，爲民祈福。」⁵¹至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終於訂定西巡日期：

內閣奉 上諭：朕於來春三月十八日啟鑾恭謁西陵，禮成後巡幸五臺，瞻禮名山，爲民祈福，所有各衙門應行事宜俱著先期敬謹預備，欽此。⁵²

仁宗強調或以「特旨」、或以「地方籲請」的形式，爲舉辦西巡揭開序幕，乃因巡幸並非制度化之例行事務。由上諭可知，先謁西陵後朝拜五臺山，以「爲民祈福」爲西巡定調。

謁陵與朝山結合於乾隆年間已有例可尋，參見表一。而奉請祖母、奉請母后西巡尤爲特色，除乾隆十五年、四十六年之外，四次西巡均有謁陵活動。然而，康熙二十二年，奉請太皇太后西巡，以及乾隆十一年、十五年、二十六年奉請皇太后西巡的盛典，是清仁宗唯一不能仿效先祖的。仁宗爲高宗第十五子，生於乾隆十五年十月初六日丑時，生母魏氏卒於乾隆四十年，終年四十九歲。除此之外，清仁宗於籌措過程中無一不仿效其父。嘉慶十六年三月初八日，禮部爲皇上謁泰陵、泰東陵，先行奏聞行禮儀注，除爲父祖祭奠，儀注內容還包括親臨孝淑皇后陵寢奠酒。⁵³

（五）決定性動機

前引上諭所示謁陵、爲民祈福的動機目的，沒有顯露西巡是經過多年思慮，與事後追述的動機連繫亦不甚明確，有必要進一步分析。清仁宗撰〈清涼山記〉，⁵⁴明確把五臺山定位爲「神京右臂」、「中華衛藏」，前者因其地勢，後者以其佛教傳統，及黃教與蒙古的關係：

山西代州五臺縣清涼山，神京之右臂，佛菩薩度化眾生顯跡福地也。山中蘭若精藍百餘所，靈蹟奇蹤不可殫述。黃教爲諸藩蒙古傾心信奉，進關朝

51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5，頁 128。

52 《嘉慶帝起居注》，冊 15，頁 512；《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5，頁 530。

53 《西巡盛典》，卷四，秩祀，頁 9a-13a。

54 清仁宗，〈清涼山記〉，《西巡盛典》，卷二，宸章，頁 15b-18a。

山頂禮者，接踵不絕，誠中華衛藏也。我朝肇基遼瀋，國號滿洲，而茲山供奉曼殊師利，同聲相應，此中因緣真不可思議矣。

清涼山諸寺院及東西南北中五臺頂，未得窮幽涉險，登峰造極，非不能也，蓋不為耳。予豈山林隱逸，累月經年遊玩岩壑，樂而忘返乎？敬闡前謨，省方問俗，崇文習武，戒逸力勤，斯皆巡典之大要也。況佛具千相，予惟一心，出世住世，相為表裏，殊途同歸，非二理也。

清帝巡幸五臺山並非只單純地「為民祈福」，實有多重目的——「敬闡前謨，省方問俗，崇文習武，戒逸力勤，斯皆巡典之大要也」；西巡還是宗教與閱武的結合與展示，而宗教性與蒙古有密切關係，蒙古因素容後再述。

關於閱武，皇帝出動大營即是由千軍萬馬組成，清仁宗回程路線特經直隸正定府、保定府，大閱標下官兵，操演陣式及馬步各項技藝，並於其後敕編《西巡盛典》，文內詳載相關諭旨、各項技藝次序、人數，並繪製陣式圖。⁵⁵

清高宗表達閱武與宗教結合的意涵十分深刻，影響了仁宗。高宗六次西巡其間所寫詩文甚多，載入《欽定清涼山志》的第一首詩甚有代表性。乾隆十一年（丙寅）九月，著有〈恭謁泰陵畢奉皇太后便道禮五臺瞻詣曼殊易州道中得詩二十八韻〉一詩，詩中除述及遍覽史蹟，有感而發，「歷歷興亡事，行行感慨增」，還描述了皇家西巡大軍的威勢，為了舉行圍獵，「神馬」、「俊鷹」必不可少；行途中修武、勤政仍不可偏廢，因有「狩巡五年舉」、「勤政傳家法」之志，也是重要理念的宣示；「梵僧」、「象教」與「家法」並舉，顯示佛教因素具有重要地位。⁵⁶

乾隆四十六年，清高宗第四次西巡，著〈娑羅樹（再依皇祖元韻）〉一詩，雖主旨宣述其「色空無得」的佛教觀點，末句「牽殷繩武勵無逸，毋忘角弓同此看」表示並未因參佛、盤遊而忘卻武備。⁵⁷

嘉慶朝重臣董誥亦影響仁宗。董誥與其父董邦達，曾伴隨清高宗西巡且留下紀念性詩畫作品。乾隆四十六年，高宗作〈題董邦達雪山兼命董誥別圖雪山得詩二首用

55 《西巡盛典》，卷五、頁 1-17；卷六，閱武，頁 1-35。

56 《欽定清涼山志》，卷四，天章，頁 1a-2a。

57 《欽定清涼山志》，卷五，頁 21。

一韻〉、〈題董誥雪山圖〉二詩，回憶乾隆二十六年西巡董邦達畫作，⁵⁸及乾隆五十一年，又作〈題董邦達雪山圖〉、〈題董誥雪山圖〉二詩以示紀念。⁵⁹清人陳康祺對照張若靄、張若澄先後於乾隆十一年、乾隆十五年高宗西巡時畫下鎮海寺雪景圖，認為張氏兄弟與董氏父子，君臣間的藝文互動都是史上少有的奇遇：

乾隆丙寅，聖駕巡幸五臺山，回鑾至鎮海寺，積雪在林，天然畫意，因命侍臣張閣學若靄寫之為圖。及庚午歲，又命若靄兄閣學若澄圖鎮海寺雪景，御筆題詩其上，有「傳語示其弟，堅癯蹤可師」之句。又辛巳西巡，嘗命尚書董文恪公邦達即景圖繪雪山。越十餘年，文恪子文恭公誥隨扈，復奉旨寫雪山圖進呈。上補題邦達畫云：「辛巳西巡攜侍臣，雪山即景寫嶙峋，今來積玉仍千嶂，圖上之人作古人。」又題誥恭進冊云：「枚氏臯隨蹕，雪山因命圖，霽情宛可挹，家法未全殊。」桐城、富陽，仍世清華，一家父子兄弟，以常楊供奉之班，擅荊關丹青之技，屬車簪筆，榮荷天褒，此承平侍從之奇遭，非特藝林佳話也。⁶⁰

董誥為仁宗親政後之重臣，西巡返京之後嘉慶十七年四月纂成的《西巡盛典》，亦由董誥領銜纂修。⁶¹事實上仁宗親政時延用一批乾隆朝曾遭權臣和坤排擠的舊臣，他們人品高潔、為士林所重，故能穩定嘉慶朝政局。⁶²然而，相較於董誥之於高宗西巡，清仁宗並無相應之文學侍從，透過西巡藝文產生跨世代聯繫的君臣關係亦無法延續。仁宗於〈西巡盛典御製序〉文末強調效法父祖之志：「觀時巡之事蹟，究竟有何盛哉，敬溯聖祖《幸魯盛典》，⁶³高宗《南巡盛典》，奚能彷彿於萬一。」標舉接續先人之作予以成全，固然反映了仁宗傳守家法、恪行孝思之志，卻也限定了西巡的性質，較少創新意圖。

58 《欽定清涼山志》，卷五，頁 24b-25a。〈題董邦達雪山兼命董誥別圖雪山得詩二首用一韻〉、〈題董誥雪山圖〉。

59 《欽定清涼山志》，卷六，頁 10。〈題董邦達雪山圖〉、〈題董誥雪山圖〉。

60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九，〈張董世以繪畫供奉內廷〉，頁 814。

61 董誥當時的職銜為：經筵講官太保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查欽奉上諭事件處尚書房總師傅管理刑部事務世襲騎都尉。

62 朱誠如，〈論嘉慶親政後中央權力的重組〉，《明清論叢》，第三輯，頁 257-267。

63 （清）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魯盛典》四十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652。此書為衍聖公孔毓圻等撰進，載康熙二十三年清聖祖臨幸山東，親祀孔廟，行九拜之禮。

三、籌辦過程

(一) 籌辦機構、成員

據《內閣大庫檔案》所存相關檔案，負責籌辦西巡事務主要是「總理行營事務處」，由和碩成親王永理等辦理。嘉慶十五年十月十四日，總理行營事務處奏請裁示辦理原則，得旨遵照乾隆年間前例。這份奏章至少由工部、禮部自內閣抄出辦理相關事宜。原摺指出，關於馬匹部分，除由內府支應外，山西巡撫亦照舊例提供。遵照前例事項之一是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總管行營多羅誠郡王弘暢所議奏事。⁶⁴

西巡往返路程大部分在直隸境內。「山西境內僅一百餘里及行宮一處，而直隸境內，自京師至長城嶺一帶有一千餘里。」⁶⁵直隸總督主要負責境內沿途行宮、道路之修整，曾先得賞銀三十萬兩，雖嘉慶十三年奉旨取消西巡，暫停一切工程，至十四年四月又遴派專員酌發銀兩，分投購料，預備擇吉開工。⁶⁶山西省主要負責管理五臺山寺院及行宮。

(二) 禁奢原則——「戒逸力勤」

嘉慶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清仁宗頒上諭懲處直隸總督溫承惠等，因辦理巡幸天津，閱視堤工，然沿途設有戲臺點綴，徒增糜費，復以硃批諭旨嚴斥警告：「朕屢降諭旨，汝等概置不聽，妄行揣摩迎合，必欲陷朕於好盤遊樂聲伎之主，是誠何心哉？嗣後一切屏絕，如再不遵守，惟革職遣戍耳。慎之，戒之。」⁶⁷約此同時，嘉慶十四年六、七月內，山西巡撫成寧至少二次奉諭旨，斷不可擅自點綴戲臺、綵牌等項目。同年六月初一日，成寧接到廷寄，仁宗明確表達辦理西巡之宗旨，並藉日前懲處溫

64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95902，「移會·成親王等奏次年三月內皇上巡幸五臺前三次儀注等由／十月二十六日」。

65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09648，嘉慶十三年正月初二日，成寧奏摺。

66 〈直隸總督溫承惠為撙節籌畫修葺五臺山行程工程事片〉，嘉慶十四年四月，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 44。

67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14290，嘉慶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溫承惠奏摺。

承惠一事，警示成寧。上諭云：

五臺為曼殊師利成道之地，……後年朕巡幸五臺，除廟宇、行宮業已次第修整外，其途間及山之上下，一應戲臺、雜伎、假山、假亭，一切點綴概不准預備，即廟前斷不准設臺演戲。朕拈香時，有喇嘛等在廟前跪接，陳設梵樂，足備觀瞻，至沿途空缺處所，所用席片搭蓋假山，塗飾遮蔽，尤為可厭。蹕路所經民間村莊，廬舍完整者，可以覘豐盈氣象，其頹垣陋室，亦可藉以知民生疾苦，正合省方觀民之義，又何必紛紛曲加粉飾乎？惟墩汎、牌坊以記疆里，可仍其舊，不過略加油飾，誌明里數，用備省覽。該撫務當仰體朕意，崇實黜浮……。⁶⁸

仁宗在上諭裡略數西巡目的是禮佛祈福、緩藩蒙古、省方觀民，因此無需演戲，備辦雜技。成寧見此上諭覆奏遵旨辦理，仍奉硃批警示：「彼時若有一綵結牌坊、一段假山、一齣戲曲，朕立命拆去，將地方官盡行革職，仍治以違旨之罪，謹記毋悔。」⁶⁹雖然直隸、山西地方可能也只是如同仁宗一樣，承襲乾隆年間成例辦理，而仁宗禁奢的態度十分堅決。仁宗還藉著大同鎮官員赴京陛見，命傳諭成寧，包括陳設、貢品、賞件，及修葺墩汎、營房，又交付兵民、喇嘛跪迎，伺應巡邏一切事宜之準則。此外尚有「修治道路不必過寬，以節民力，尤禁結綵、演戲、音樂，以省糜費」等細節。⁷⁰

嘉慶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仁宗以為直隸、山西二省已預為籌備，嚴行禁絕一切酬應使費，且再行申諭直督溫承惠，傳諭護理山西巡撫素納。⁷¹不到二個月，嘉慶十五年三月十六日，針對直督溫承惠奏報添蓋板房一事，斥為浪費，是日即奉到硃批：「朕何難據奏降旨，將溫承惠交部議處，沽美名而邀眾譽，朕所不肯為，此後再如此嘗試，亦只得交議矣。欽此。」⁷²溫承惠自此難邀恩寵，然而新任晉撫素納卻無警覺心。

嘉慶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仁宗針對晉撫素納籌畫失當，直接詔告天下：

68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14440，嘉慶十四年六月初四日，成寧奏摺。

69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14440，嘉慶十四年六月初四日，成寧奏摺。

70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14744，嘉慶十四年七月初八日，成寧奏摺。

71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5，頁 34。

72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5，頁 121。

內閣奉上諭：朕前此俯允晉省士民之請，於明年三月內親詣五臺，為民祈福，因恐該省地方官員踵事增華，多為豫備，徒滋糜費，特將該處各廟宇內指出十處係當日曾經皇考高宗純皇帝屢次親臨者，降旨交護理山西巡撫素納，令其照舊修葺，此外毋得違旨豫備，該護撫接旨自應恪遵妥辦，將應行修葺者敬謹豫備，不得草率貽誤，其未經指出者，豈得任意增添。乃本日據素納奏稱，……又於前次指出十處之外，任意加增三十處之多，大興工作，不遵前旨，明係承辦之員欲為開銷浮冒地步，……上不能體朕之心，下不知恤民之苦，太不曉事，素納著傳旨嚴行申飭，並交部議處，……。

73

從上諭內容可知，五臺山整修的範圍僅限高宗屢次親臨之十寺，其他寺院、行宮概不准興修；五臺山山頂五寺僅遣官行禮，亦無須動工。不久，吏部奏請將任意增修五臺廟宇之素納革職，嘉慶十五年四月初一日，仁宗據此諭斥：

朕來年巡幸五臺，為地方祈福，屢經申諭毋許徒滋糜費，其應修廟宇指出十處特令修葺，以備駐蹕時親詣拈香，乃素納竟欲增修至三十處之多，豈朕在彼數日祇以拜廟為事耶？若云預備遣官行禮，亦不過灑掃潔淨，何必徒事觀美，此皆為承辦之員預作浮冒開銷地步，素納被其慫恿本應鑄職，姑念尚未動工，著從寬改為革職留任，來歲朕臨蒞時，如應修各工不能堅實，其不應修任意增添，甚或加以點綴、備辦音樂，必當從嚴褫革，決不寬貸。⁷⁴

仁宗譏諷素納以為西巡僅是拜廟而已，因素納尚未動工，罰以革職留任。

嘉慶十四年以後，晉撫頻頻更換，主因五臺工程之弊。嘉慶十四至十六年間，二年內歷任山西巡撫，包括署理、護理者共計五人：成寧、金應琦、初彭齡、素納、衡齡。⁷⁵初彭齡、衡齡二人是籌備西巡過程中，較受仁宗重視的。

7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起居注冊》，嘉慶十五年庚午三月二十二日。另參《嘉慶帝起居注》，冊15，頁133；《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二十七，嘉慶十五年三月丙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滿文《起居注冊》，編號114001794，嘉慶十五年三月下。

7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起居注冊》，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夏四月上。另參《嘉慶帝起居注》，冊15，頁143；《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5，頁139；《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二十八，嘉慶十五年庚午夏四月；國立故宮博物院，《大清仁宗睿皇帝滿文實錄》，編號113000765。

75 各任晉撫任職日期：成寧（嘉慶十一年九月至十四年七月，遷陝西巡撫）、金應琦（山西布政使護理，八月疾，十一月遷）、初彭齡（十四年八月署，十一月補授，十二月遷陝西巡撫；衡

刑部右侍郎署山西巡撫初彭齡接替山西布政使護理巡撫金應琦，⁷⁶金應琦病請開缺，命來京授刑部右侍郎。初彭齡是仁宗特意安排查察工程的，嘉慶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即具奏聞訪查藩司劉清現在居官情形，布政司劉清爲官雖好然爲屬員欺弊，據報五臺山工程僅完成五成，並非前撫所報八成，並推薦素納來任。⁷⁷嘉慶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初彭齡奉上諭，密查前山西巡撫成寧縱容家人在外滋事、十餘州縣倉庫不能完全，及將劉清更換藩司等事。⁷⁸

刑部右侍郎署山西巡撫初彭齡，於十四年九月八日接印，九月二十八日，奉旨親往五臺山履勘工程。十月初七日，初彭齡奏報太古縣前任知縣蘇佐清領過辦理工程銀六千餘兩，本年春月，經前巡撫成寧奏參褫職，至今竟未將領過銀兩全數交出。⁷⁹十月九日，又奏報請旨查辦玩誤五臺山工程人員，包括大平縣、文水縣、代州、隰州等承修工程修理不妥，未及成數，應先行革職，勒令趕修。⁸⁰

衡齡到任晉撫後，素納仍任山西布政使，專務五臺工程，值陛見時機，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軍機大臣字寄衡齡云：「五臺工程祇有道府駐劄經理，尙恐呼應不靈，傳諭藩司素納在彼督辦，不必來京陛見，來春同衡齡馳赴前途接駕瞻覲可也」。⁸¹然而同日，軍機大臣亦字寄直督溫承惠論及素納陛見一事：「至素納來京陛見一節，素納現非該督屬員，其應於何時來京，應自該省巡撫酌定，溫承惠何須干預耶？」⁸²素納原爲直隸按察使，直督溫承惠爲其上司，改調山西後，仍與溫承惠關係密切。

齡，代）、素納（十五年三月、四月，山西布政使護理）、衡齡（十五年四月至十六年八月）。《清史稿校注》，冊九，卷二百十，表四十三，疆臣年表七，頁 6779-6788。素納、衡齡任職年月參見〈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下）〉，《歷史檔案》，84(2001.4)，頁 26-29，具奏人職名、日期。

76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15567，嘉慶十四年九月五日，軍機大臣字寄刑部侍郎署山西巡撫初、山西巡撫金奉上諭；編號 404015362，嘉慶十四年九月八日，初彭齡奏聞撫臣金應琦感受風濕醫治漸愈奏明現在情形尚需調理緣由；編號 404015363，嘉慶十四年九月八日，刑部右侍郎署山西巡撫初彭齡奏報臣署印任事日期并感激下忱。

77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15439，嘉慶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刑部右侍郎署山西巡撫初彭齡奏爲密摺奏聞訪查藩司劉清現在居官情形。

78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 404015568，嘉慶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字寄初彭齡奉上諭。

79 〈署山西巡撫初彭齡爲遵旨查辦五臺山行宮工程事奏摺〉，嘉慶十四年十月初九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下）〉，《歷史檔案》，84(2001.4)，頁 25。

80 〈署山西巡撫初彭齡爲請旨查辦玩誤工程人員事奏摺〉，嘉慶十四年十月初七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下）〉，《歷史檔案》，84(2001.4)，頁 25-26。

81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5，頁 530。

82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5，頁 531。

直督、晉撫與山西藩司原應一體籌畫西巡工程，然而仁宗認為議論他省官員陞見得當與否並非臣下之道。類似事由亦有近例，嘉慶十三年二月，護理安徽巡撫印務布政使鄂雲布，曾與隔省巡撫馳札遠商本省安慶府知府缺，遭仁宗傳旨申飭。⁸³

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張映漢調補山西布政使，素納調補湖北布政使。⁸⁴爾後張映漢任湖北巡撫，素納仍為湖北布政使。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方才公佈西巡日期，三日後即將素納調任，素納的行事作為不被仁宗認同，未因五臺工程有所晉昇，上述十五年三月間妄行增修行宮，及七月間妄自蒐集高宗詩文之事，尤其顯著。是故，嘉慶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命軍機大臣字寄衡齡，衡齡奏稱臺山工程計十二月初間全可告竣，屆時仍令素納入都陛見請訓等語，素納現已調補湖北布政使即應來京陛見，便可由京前赴湖北新任。⁸⁵十一月二十五日，復字寄衡齡，不必俟張映漢到晉與素納當面交代，素納應趕赴新任。⁸⁶

山西巡撫、布政使在籌辦西巡過程更換多人，少有功成圓滿者，甚至遷調之後，也因緣罪革職。例如：嘉慶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成寧緣前山西巡撫任內擾累州縣，革職；初彭齡曾獲肯定，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亦緣前山西巡撫任內任性乖張，加恩降補四品京堂，就近侍親。⁸⁷

總之，從晉省籌辦西巡諸多不符君心的情形看來，對於舉辦西巡，中央與地方的認知並不一致，君臣雙方頗有差距。

（三）預查西巡儀典、行程

1. 確定拜廟清單

嘉慶十五年三月初五日，傳旨護理山西巡撫布政使素納，照乾隆五十七年臨蒞拈

83 當時安徽巡撫董教增署理湖北巡撫，護理安徽巡撫布政使鄂雲布關於安慶府缺應與兩江總督鐵保商議，不應與董教增商議。《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編號404010076，嘉慶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護理安徽巡撫印務布政使鄂雲布奏為奴才本任應管之事不應與隔省巡撫馳札遠商敬聆聖訓感懼凜遵謹此叩謝天恩。奉硃批：「一味因循非實心任事之道，尸祿保位豈為臣致身之理，亟宜效法初彭齡，以顏檢為戒，勉之。」

84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5，頁538。

85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5，頁553。

86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5，頁555。

87 《清史稿校注》，冊九，卷二百十，表四十三，疆臣年表七，頁6784、6786。

香之寺廟十處，照舊修葺、預備，此外各處廟宇均無須多為預備。此十寺順序為：殊像寺、菩薩頂、塔院寺、顯通寺、羅喉寺、壽寧寺、玉華池、大螺頂、鎮海寺、普樂院；據「乾隆五十七年五臺拜廟單」，載明當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白雲行宮、臺懷行宮二處至各廟寺行程里數。⁸⁸參見附表二「乾隆五十七年清高宗五臺拜廟行程一覽表」。

嘉慶十六年二月初四日，諭令禮部及太常寺，查明乾隆年間歷屆巡幸五臺，是否遣官致祭保定府境堯母陵。⁸⁹二月十九日奉旨，鑾輅經望都縣，仍照乾隆五十一年之例，親詣堯母陵閱視，並於望都城北之堯帝廟親詣拈香。⁹⁰此祭因高宗歸政之年正與堯相同。⁹¹

2. 行宮貼落畫幅、詩章

西巡沿途行宮需要添加裝飾，主要以畫幅和御題詩匾聯為主。早在嘉慶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懋勤殿太監趙喜已傳旨交如意館繪畫，有關巡幸五臺沿途等處行宮，共用畫條、橫披、畫對二十六件，包括畫斗三張、畫條二張、畫橫披十三張、畫對八副，尺寸不一，計三十四張。⁹²

關於詩貼黏懸掛之處則需直督、晉撫預為測度。嘉慶十五年七月十七日，上諭溫承惠、衡齡辦理：

各行宮貼落詩章，候朕隨時書寫頒發外，所有沿途及該處指定臨蒞拈香各廟宇，從前曾經皇考高宗純皇帝御題匾額、對聯，著溫承惠、衡齡敬謹詳查將匾對字句、尺寸詳悉開註清單進呈，並於各廟相度，或在原懸匾聯之對面，或在下方擬定處所奏請朕親題匾聯發去懸掛，如地面不甚寬敞之處，即祇題一匾、祇題一聯，均無不可，其尺寸總須較皇考御題略為窄小，務於九月內奏到，以便親書頒發，至明年並不臨蒞之廟宇，即有皇考御題匾聯，均不必恭查開載。⁹³

88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5，頁 107-108。

89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50-51。

90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75-76。

91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九，〈高宗歸政之年與堯相同〉。

92 《活計檔》，003-567-583，如意館，嘉慶十五年三月十一日，裁作、匣作、金玉作、木作等呈稿。

93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5，頁 333。

上諭裡再次重申查對高宗御題的範圍只限於明年西巡之親臨廟宇，仁宗親書之匾聯尺寸不敢超過父親御題。晉撫衡齡的查點動作稍快，冒昧將各處御書匾聯等件悉行恭繳，遭到申飭，並令衡齡回奏是否聽從何人之言，原來先前衡齡因直督溫承惠告知直隸省曾經恭繳御筆。仁宗得知後申飭云：「思欲仿照辦理，且當先行奏明請旨，乃衡齡既不請旨於前，而於委員齎送到京時，又不附摺陳奏，率將所有御筆一概繳進，實太糊塗冒昧。」⁹⁴諭令將此批高宗御題除有若干件數交懋勤殿查明收貯，其他仍造冊發交齎回懸掛。⁹⁵

高宗歷屆頒發臺懷各行宮、廟宇御筆詩匾、對聯共一百七十六件。⁹⁶由嘉慶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諭可知，沿途應懸貼御筆乃事先寫完，並非即興之作，或許先前調查蒐集高宗詩以求完美對應。⁹⁷

至於直隸境內行宮、座落甚多，而仁宗御筆匾對、貼落僅二十四件。行宮、座落所用御筆向不交直隸經管，只部份交予直督。⁹⁸

3. 駐蹕御幄

清帝巡幸途中，若無行宮、寺院座落可供駐蹕，必須組建大營，駐蹕御幄。御幄是一個以正中圓幄為中心，配合其他御用幄帳所建立的範圍，據《大清會典圖》所載，御幄包括：高二丈之「圓幄」，幄正中設御座；前庭左右各設「圓幄」一個，御座後有一「長幄」，更後為六「圓幄」，其東置有佛堂。⁹⁹大營及御幄形式參見圖5、圖6；仁宗西巡之大營樣式見圖9。

圓幄即蒙古包，仁宗西巡所需用御幄之製作亦為籌備要項，御用蒙古包由內務府武備院及早預備，使用過程得宜，搭蓋蒙古包披甲人等，及支搭兩分大營員外郎、司幄均受得賞賜。¹⁰⁰

據《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所載，嘉慶十五年三月起

94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5，頁368。

95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5，頁341-342。嘉慶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寄信上諭。

96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5，頁341。

97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5，頁547。

98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5，頁547。

99 《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重修本），卷一百四，武備十四，皇帝駐蹕大營、皇帝駐蹕御幄。

100 《西巡盛典》，卷十，褒賞，頁10a-11a。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初七日。

已開始備辦御幄事宜。首先查得西巡應用二丈蒙古包，及三丈四方房，現存狀況不良：「二丈蒙古包內有圍屏套一個，稍有磨蹭，應用修理，三丈四方房內床板布三分，破爛不堪應差，應行換做。」¹⁰¹又是年六月二十七日，據武備院管庫帳房頭目三福等呈，「查得庫貯二丈蒙古包、穿堂一丈四方房二分，內有舊不堪應用之件，相應呈明換做，以備明年巡幸五臺沿途應用。」二丈蒙古包應行換做物料包括：「長一丈一尺底徑一寸二分斑竹椽子八十根（照樣隨鋼筒纏藤箍，此項殘壞鋼筒交回該處）。圍屏壁子一分，照樣糊飾。」一丈四方房內應換楠木佛桌二張（粘補燙蠟）。¹⁰²

是年七月，清仁宗親自指導御幄陳設，改造三丈四方房形制，命做「盪樣」模型時粘簽所欠字畫之處。武備院案呈情由：

檔房過印文一件內開，武備院為換做三丈四方房應換做什物事，北鞍庫案呈，本年七月二十八日，由行在武備院寄來七月二十四日召見本院卿賽面奉諭旨：明年五臺應用三丈四方房內，現有庫貯未經改做之三丈四方房一分，即照依新改做之三丈四方房式樣，于今冬改做妥協，至所欠字畫，俟做得時盪樣粘簽請旨。欽此欽遵，等因寄來，相應遵奉諭旨將應改做之三丈四方房，東間內二層隔斷撤去，仍安曲尺，寢宮床東西放長，前面窗戶挪正，改安方窗，木架損壞，毡片糟舊並改做，寢宮花連單頂棚，洋毡裏牆木床及添做之活腿條桌，花梨木須彌座，紅猩猩毡裕簾等項什物，另繕粘單，咨行各該處派員擬定日期前赴本院自行踏勘式樣，丈量尺寸，上緊如式成做，務于本年十月內，全行做得，交付本庫演試妥協，以備呈覽，相應咨行造辦處等處，飭令該作照依本院原改做之式樣，速為成做，勿致遲延可也等因呈明堂臺總管批准記此。¹⁰³

據此，「三丈四方房」應為蒙古包圓幄，後方之「長幄」為皇帝寢宮，內有曲尺影壁，其下欲置高六寸「花梨須彌座」二塊；御幄內之裕簾、隔斷則大量使用名貴的紅猩猩氊。

參照清代當舖行情，紅猩猩氊，也稱猩猩紅氊，即是哆囉呢（一種較厚的寬幅毛織呢料），猩猩血染之，出於西洋，長一百多尺，寬四尺。¹⁰⁴乾隆五十一年，西巡行

101 《活計檔》，003-557-583，嘉慶十五年三月初一日，裁作呈稿。

102 《活計檔》，003-377、378-583 嘉慶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油木作、銅作、祿作呈稿。

103 《活計檔》，003-411、412、413-583，嘉慶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104 《中國古代當舖鑒定祕籍（清鈔本）》，頁18。

至直隸、山西交界龍泉關，遇雪，高宗諭，凡御前大臣、乾清門侍衛等例著猩猩氍帽，¹⁰⁵可見此毛料為備辦西巡所不可或缺。

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查得「庫貯三丈四方房穿堂，以及一丈五尺蒙古包之什物內，有虧舊不堪應用之件，相應呈明換做以備明年巡幸五臺沿途應用。」其中同於上述之三丈四方房，亦即「長幄」、「穿堂」，應換物料有：「白布袷棚做穿杆，用長一丈二尺班竹插樺穿杆二十四根，纏筋畫樺皮，每根隨鐵箍一道，每道寬一寸錠給」。¹⁰⁶

《活計檔》所載蒙古包形制當為嘉慶十六年西巡實用之情況，相較於《大清會典圖》內圖說所載，較為詳盡，尤其各種建料、隔間設計均有述及，二者相互配合，有助於後人理解。

4. 御用車駕

西巡途中，清帝除騎馬外，需用車駕。西巡前，仁宗為往熱河及嘉慶十六年春圍均使用「黃圓頂車」。¹⁰⁷西巡所用者為黃圓頂車一輛、備用黃圓頂車一輛，據《活計檔》所載，西巡結束後鞍韉等物，內有油漆爆裂，已不堪使用，經造辦處檢修情況，可略知其飾用項目，包括：黃紡絲油單套、黃布半元、拴車飾件、黃絲線小條、黃色鹿皮、皮鞍韉、黃鞍籠、黃絨長套繩、黃絨拌檔繩、洗黃油墩布、明黃紡絲、玻璃等等。¹⁰⁸

5. 馬匹

據《內閣大庫檔案》有關總理行營事務處史料，仁宗西巡所需馬匹亦遵乾隆事例。嘉慶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奏請裁示辦理原則，得旨遵照乾隆年間前例。這份奏章至少由工部、禮部自內閣抄出辦理相關事宜。原摺指出，關於馬匹部分，除由內府支

105 《欽定清涼山志》（乾隆），卷六，天章四，〈龍泉關五依皇祖元韻〉，頁1b。

106 《活計檔》，003-495-583，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油木作、銅作呈稿。另亦查得「熱河收貯七丈二尺蒙古包並哨內應用三丈四尺蒙古包，亦有應行修理更換之項。」

107 《活計檔》，003-496、497-583，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003-518-583 嘉慶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08 《活計檔》，004-53、54-629，嘉慶十六年六月十三日，油木作。

應外，山西巡撫亦照舊例提供。¹⁰⁹ 而禮部移會內閣稽察房檔案除載永理原奏文，尚存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總理行營多羅誠郡王弘暢辦理臨幸五臺山籌辦事宜。其中所用馬駝數目驚人，真可謂「千軍萬馬」之勢。原滿文摺件及硃批提供諸多訊息（圖 7），漢譯如下：

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總理行營多羅誠郡王弘暢等謹奏，為議奏事。皇上明年三月初八日起行恭謁泰陵，自彼處前往五臺山，除一切應備事宜，交各該管處照依從前辦理外，應派出侍衛三班，前鋒、護軍七百員，各處官兵、拜唐阿人等，悉皆斟酌各差派出。所派官兵俸餉照例先行給發。應騎馬匹照例給領。皇上所用大城蒙古包、帳房等項，除全帶二分外，應備毡包等件，著工部依例帶往。據此，所需馬駝，臣等查得前次官兵騎乘所用近一萬一千匹，大城蒙古包、帳房等項，及御茶膳房等處駝隻曾用七百八十四匹有餘。查此次所需馬駝亦一萬餘匹，故交兵部（察照辦理）。現直隸隸養馬駝三千五百餘匹，除全行調用外，不足之數按照前例，自圓明園、健銳營、火器營，及親軍護軍營、八旗官兵拴養馬匹內添用。應用車輛照例辦用。又沿途所駐驛站、應備之尖營、橋路等項，皆交直隸、山西巡撫等照例辦理。所有商販使其寬裕經營。官兵所乘官馬自京城去至五臺山，自五臺山返回之時正值春季，馬匹不無疲瘦之處，仍照前次交山西巡撫，於彼處挑選綠營馬二千匹領至臺懷地方，以備更換。行抵之際，派大臣監

109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88585，「移會·總理行營事務處奏五臺事宜等由／十月二十三日」。滿文轉寫：bigarame yabure baita be uheri icihiyara hošoi mutengge cin/ wang yong sing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 be baire jalin ishun aniya ilan biyade/ dele u tai šan alin de enggelenerede amban be abkai wehiyehe i/ dehi ningguci aniya susai emuci aniya susai nadaci aniya i jergi/ ilan mudan i dorolon ejehen afaha arafi gingguleme/ dergici eici onggolo ilan mudan i songkoi icihiyabure [+ eici encu icihiyabure] babe/ hese wasimbuha manggi dahame icihiyaci genere hafan cooha ursede yalubuci acara amban [alban] morin be coohai jurgan de/ afabufi ice sibšalame toktobuha kooli be baicafi ton be/ bodome icihiyafi bahabureci tulgiyen sansi tai hūwai de morin/ halara de coohai jurgan ci sansi i giyarime dasara amban de/ bithe yabubufi onggolo mudan i songkoi belhebuk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saicungga fengšen i tofohoci aniya juwan biyai/ juwan duin/ wesimbuhede/ hese onggolo mudan i fe kooli songkoi icihiya sehe.；總理行營事務處碩成親王永理等謹奏，為請旨事。明年三月皇上親詣五臺山，臣等謹將乾隆四十六年、五十一年、五十七年等三次儀注繕寫清單恭呈御覽，或照前次辦理或另行辦理之處伏乞皇上訓示，奉旨遵行，除隨行官兵人等應用官馬交兵部查照新開定例按數發給外，於山西臺懷換馬之時，著兵部咨行山西巡撫照依前次備辦，為此謹奏請旨。嘉慶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奏。奉旨：著照前次舊例辦理。欽此。」此件移會本文為：「工部為移會事。營繕司案呈，內閣清字抄出，總理行營事務處奏五臺事宜一摺，相應抄錄原奏移會可也。須至移會者。計粘單一紙／右移會稽察房／嘉慶十五年十月日／員外郎薩」。

看官兵、太監等更換，所換馬匹，即填補該處綠營馬數。因此次往返共行三十七日，官兵應否皆給三十七日行糧之處，俟奉旨後，交各該管處遵行辦理。為此謹奏請旨等因。奉旨：依議。欽此。¹¹⁰

由此奏可詳知籌備西巡的規模，扈從人員所屬部門，以及供支馬匹的營伍單位。拉載及騎乘需用馬匹超過一萬匹，尚且不包括駝隻。馬匹來源尚包括山西省，需供應二千匹以備換乘用。乾隆五十六年，總理行營事務處所議於山西臺懷時可通融換

110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95902，「移會·成親王等奏次年三月內皇上巡幸五臺前三次儀注等由／十月二十六日」，滿文轉寫：abkai wehiyehe i susai ningguci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uyun de/ bigarame yabure baita be uheri icihiyara doroi yargiyangga/ giyūn wang amban hūng tsang sei gingguleme/ wesimbungge gisurefi wesimbure jalin/ dele ishun aniya ilan biyai ice jakūn de jurafi/ elhe munggan de gingguleme dorolofi tederi u tai šan alin de/ generede eiten belhebuci acara baita hacin be geren harangga/ bade afabufi kemuni nenehe songkoi icihiyabureci tulgiyen hiya/ sabe ilan idu gabsihiyan bayara be nadan tanggū tucibuki/ geren bai hafan cooha baitangga ursebe gemu meimeni alban de/ teisulebume isingga be bodome kemneme tucibuki tucibuhe hafan cooha fulun ciliyan be kooli songkoi doigonde/ jalukiyame bahabuki yaluci acara morin be kooli songkoi buki/ dele baitalara amba hoton monggo boo tanggūli maikan i jergi/ hacin be gulhun juwe ubu gamabureci tulgiyen weilere jurgan i/ belheme gamaci acara hoton hadagan jergi jaka be kooli/ songkoi gamabuki ede baibure morin temen be be baicaci/ nenehe mudan hafan coohai yalure morin emu tumen emu minggan/ hamime baitalaha amba hoton monggo boo maikan jergi/ hacin jai amsu cai boo i jergi bai acire temen nadan/ tanggū jakūnju funceme baitalaha bihe ere mudan baibure/ morin temen be baicaci inu emu tumen funcere morin/ baibure be dahame coohai jurgan de afabufi ne jyli de/ afabufi ulebure ilan minggan sunja tanggū funcere morin/ temen be yooni fideme gajifi baitalabureci tulgiyen isirakū/ morin be onggolo mudan i songkoi/ ioiwan ming yuwan silin dacungga kūwaran tuwai agūrai kūwaran jai/ gocika bayara bayarai kūwaran jakūn gūsai hafan cooha/ hūwaitaha heren de ulebure morin i dorgici nonggime baitalaki/ baitalaci acara sejen be kooli songkoi icihiyafi baitalaki jai/ jugūn i unduri giyamun tebure belhibuci acara dedun uden/ jugūn doogan i jergi hacin be gemu jyli i uheri kadalara amban/ sansi i giyarime dasara amban sade afabufi kooli songkoi/ icihiyabuki eiten hūdai ursebe gemu fulukan i isibufi/ hūdašabuki hafan coohai yalure alban morin gemun hecen ci/ u tai šan alin de genere u tai šan alin ci marifi amasi/ jiderede jing niyengniyeri erin morisa šadara macure ba akū/ obume muterakū kemuni nenehe mudan i songkoi sansi i giyarime dasara amban de afabufi tubai niowanggiyan turun i morin be/ juwe minggan sonjofi tai hūwai sere bade dalime gamafi/ halara de belhebume nerginde isinaha manggi tucibuhe ambasa/ tuwame hafan cooha taigiyan sade halabuki halaha morin be/ uthai tubai niowanggiyan turun i morin i ton de jukibuki/ ere mudan amasi julesi uheri gūsin nadan inenggi yabubure/ dahame hafan cooha de gemu gūsin nadan inenggi bigan/ kunesun bahabuki acanara acanarakū babe/ hese wasinjiha manggi geren harangga bade afabufi dahame icihiyabiki /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wesimbuhed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此件移會本文為：「禮部為移會事。祠祭司案呈，嘉慶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內閣抄出總理行營和碩成親王等奏，次年三月內皇上巡幸五臺，將前三次儀注繕寫清單恭候欽定等因一摺。嘉慶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奏，奉旨著照前次舊例辦理。欽此。抄出到部，相應抄錄清字原奏。恭錄清字旨意，移會稽察房可也。須至移會者。計粘單一紙／右移會稽察房／嘉慶十五年十月日」。

馬一事，於次年高宗西巡起鑾前一日，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七日，已有所調整，上諭指示：「向來換乘馬匹時，往往王公大臣、官員兵丁等尚未行抵該處輒先期差人前往更換，又不執紅單，任意牽拉，幾同搶掠」等弊害，此次必俟欽派驗收馬匹大臣到後，執紅單檢驗後，方准驗單放馬。¹¹¹

仁宗於西巡途中對於山西換馬一事又有調整，據《五臺圍檔》所載滿文上諭，原訂山西巡撫備馬二千匹，除六百匹交上駟院供換乘外，其餘著巡撫領回，乃因西巡陣隊龐大，一千四百匹馬仍不足均分官員換乘，考量官員領食俸餉、養廉銀，起行前已蒙賞賜，應扣剋之項亦已伸期，唯兵丁人等得分較少，不足喂養馬匹，著全賞以半月錢糧做為喂馬分數，此項錢糧於此地賞得。¹¹²

喂馬所需草豆亦請直督、晉撫，沿途扈從官兵用馬騾所需草豆甚多，恐招沿途民戶「射利居奇，以致艱於購買」，著預為籌畫，溫承惠、衡齡飭令所屬於附近營盤處商販，令其儲備寬裕、「公平交易」。¹¹³

至於仁宗是否騎馬？據其詩作「瞻禮黛螺旋，攬轡問巖壑」所示，在五臺山瞻禮名勝黛螺頂時，曾騎馬造訪。¹¹⁴

5. 留京、扈從辦事官員

西巡過程中國家重要政務的處理，由留京辦事人員與扈從軍機大臣、章京協理。從檔案中可見相關名單，嘉慶十六年三月初六日，決定留京辦事親王、滿漢尚書各員，至少包括有成親王永理、協辦大學士明亮、劉權之，及尚書瑚圖禮等，負責協辦官員補放事宜，除月選官，文職知縣以上、武職守備以上俱候皇上回鑾帶領引見，其餘著王大臣驗放該部。¹¹⁵至於扈從軍機處滿漢章京共十七人隨行，其職名可見於《五臺圍檔》。軍機處除有滿漢章京隨行，所有滿漢緊要檔案，亦攜載往返，數量亦多，需車五輛，應用馬匹十四匹，這些需求乃交兵部備辦；至於滿漢章京十七人應

111 《乾隆朝上諭檔》，冊 16，頁 706。

112 《五臺圍檔》，頁 51-52；另參《西巡盛典》，卷三，恩綸，頁 10。

113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30，嘉慶十六年正月十八日。西巡途中即拿獲偷竊賭博等案共十一起，並獲希圖包攬差務之民人孟四，嚴行審訊，參見《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55、165。

114 《西巡盛典》，卷一，宸章，頁 16b。

115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98-99。

領「野外盤費銀」則由軍機處咨行戶部後，出具印文發放領取；此十七員隨從三十七日，總計共需領銀八十一兩七錢七分。¹¹⁶

（四）臺山生息銀

五臺山自乾隆年間有專款經費提供修繕之用，此「臺山生息銀」乃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山西巡撫明德奏請議准。時因臺山工程歲修需費，經明德奏明將司庫閑款銀一萬四千餘兩交商生息，做為每年歲修臺山工程及一切公用。¹¹⁷而此生息銀每年可得息銀一千七百餘兩。此項專款為日後五臺山常年修繕重要經費來源。

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山西巡撫塔永寧奏，五臺山顯通寺被火毀損，重修所需工料，除木料可於本處各寺官山砍伐應用，估計該寺僧只可支應三千餘金，另尚需五、六千金，此費用即可由「五臺歲修生息銀兩」支應。¹¹⁸

唯常年歲修經費亦來自於商捐，而部分商捐又添為生息銀。乾隆二十五年，山西河東鹽商、富商為明春之西巡乃踴躍捐輸，捐銀達三萬一千餘兩，高宗曾指示山西巡撫鄂弼可用於建造行宮，所用之餘仍歸還。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山西巡撫鄂弼奏報，行宮用現成木料、裝修率皆樸質，修建所需工料銀僅二萬有奇，西巡時皇帝又賞給二萬兩，無需再動用商捐經費，唯五臺山自長城嶺以下至菩薩頂，沿途寺廟極多，又各臺頂、沿途均有廟宇，修繕過廟宇統計三十餘處，共用過工料銀二萬五千八百七十三兩，請於此商捐存庫銀三萬兩內動支，所餘四千一百二十六兩，原傳令各官商領回，而稟稱此捐公之費，所餘無從分給，請仍留司庫，故請旨交商營行運，以一分交息，做為臺山歲修工程及省會公用之需。¹¹⁹

乾隆五十五年，據山西巡撫海寧奏報，署兵部侍郎虔禮寶前在山西按察使任內，

116 《五臺園檔》，頁 103-104。

117 據〈山西巡撫鄂弼為報五臺山歲修工程及動用餘剩商捐息銀事奏摺〉，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 36。

118 〈山西巡撫塔永寧為查明五臺山顯通寺被火毀損情形取辦理興修事奏摺〉，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 34-35。

119 〈山西巡撫鄂弼為報五臺山歲修工程及動用餘剩商捐息銀事奏摺〉，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 36。

曾借用「藩庫臺山公用銀兩」一萬五千兩捐助修理五臺山石塔工程，至是年六月查核已解交全完，經山西藩司查收。¹²⁰山西按察使虔禮寶欲捐修石塔而借用臺山公用銀，應即臺山生息銀。

然而，此做為歲修經費不符皇上西巡所需，後者項目眾多、費用龐大，需另行估算。乾隆二十六年，即高宗第三次西巡，僅山西境內所有行營、尖營、道路、橋座修治費用一項，山西巡撫明德原奏請戶部核銷四千七百一十五兩四錢，經戶部議覆准銷四千四百二十八兩四錢，此項目超過每年臺山生息銀兩近三倍之數，只能於乾隆二十五年山西省耗羨內動支。¹²¹仁宗籌辦西巡尚命軍機處查覆乾隆年間六次巡幸五臺山，各種加恩賞賚次數、項目，其自乾隆二十六年起，賞給直隸、山西修理座落銀兩約一、二萬兩，自准商捐項或長蘆鹽運庫應解廣儲司項下撥解，清單可見於《五臺圍檔》及《上諭檔》。¹²²

嘉慶年間修葺與部分西巡所需，亦來自此生息銀。嘉慶二年閏六月，臺山生息銀節生積存已達六萬五百二十一兩。¹²³嘉慶二年九月，五臺山各處工程通共估需工料銀三千九百八十六兩，仍於臺山生息銀內如數動支。嘉慶七年四月，生息銀尚存四萬七千五百九十七兩，是年五臺山修葺各寺所需工料銀兩，山西巡撫伯麟奏需三萬二千三百六十七兩六錢七分三厘，准於臺山生息銀項下動支。¹²⁴

嘉慶七年，繕修範圍除各寺院之外，附近行宮、尖營因前年山水暴發，受災情況較各寺廟嚴重，山西巡撫伯麟奏請所有工程費用銀九萬兩以巡撫、兩司、四道及經管稅務之太原府、潞安府、平陽府「養廉銀」內分年攤捐。此捐輸之請未蒙允允，卻開啓日後以緩修為主，及舉辦西巡的想法。¹²⁵

120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090269-001，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日，移會。

121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53156-001，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移會。

122 《五臺圍檔》，頁 115-121；《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80-82，嘉慶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123 〈山西巡撫蔣兆奎為請修葺五臺山廟宇事奏摺〉，嘉慶二年閏六月初五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 37。

124 〈山西巡撫伯麟為勘明五臺山急修緩修各廟工分別籌辦事奏摺〉，嘉慶七年四月初七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 39。另見《內閣大庫檔》，登錄號 150287-001，嘉慶七年四月，移會。

125 〈山西巡撫伯麟為請捐養廉銀以充修葺五臺山行宮款項事片〉，嘉慶七年四月初七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 40。〈山西巡

嘉慶九年四月，護理山西巡撫張師誠為續修五臺山廟宇，需工料銀一萬六千四百七十四兩七錢六分五厘，奏請查照前例於臺山營運生息項內動支，毋須另籌內府帑項。¹²⁶

嘉慶十六年之西巡經費亦有部分得自捐輸，晉撫衡齡奏稱，河東商人王恒泰欲輸銀二十萬兩以備賞賚。仁宗考慮河東甫經復商，辦運資本尚未寬餘，賞賚亦無需銀二十萬兩之多，著收銀十萬兩，且照該商所請，先在藩庫閒款內借撥備用，分兩年隨課歸還。¹²⁷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初四日，上諭噶勒丹呼圖克圖、章嘉呼圖克圖及所領各寺喇嘛於菩薩頂誦經三日，且包括各廟及自京隨來之喇嘛共賞銀三千五百兩，總計賞銀五千兩，由儲山西之鹽商人等所交銀十萬兩項下動支。¹²⁸

西巡所需皆動支正項，不令擾累閭閻，惟掃除預備，未免稍資民力，所有山西通省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二。¹²⁹五臺縣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蠲免十分之三。¹³⁰

四、崇文獻賦、省方問俗

習武崇文是巡幸的主要動機，其中崇文的表現主要是鼓勵天下士人，尤其是籍隸山西者，讚頌西巡所反映的皇朝盛世；皇帝本身亦有詩文紀事，並且命詞臣編纂《清涼山志》、《西巡盛典》；然而，所進獻文冊亦發生出乎意料之外的「文字獄」案件。省方問俗以周知下情，皇帝與地方官員不得不面對突遇的叩關案件。

撫為五臺山廟工修理完竣及請修五臺山行宮事奏摺》，嘉慶九年二月十八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40-41。

126 〈護理山西巡撫張師誠為續修五臺山廟宇估需工料銀兩事奏摺〉，嘉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歷史檔案》，83(2001.3)，頁42。

127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6，頁30-31。

128 《五臺園檔案》，頁45-46，滿文諭旨；《西巡盛典》，卷九，褒賞，頁25。

129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6，頁125。

130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16，頁122。

（一）崇文：獻賦、編書

西巡途中，山西籍隨圍官員乃至於「山西紳士」，均紛紛進呈詩冊，另有無職廢員如原任通政司經歷宋調梅等十員，亦進呈詩冊。¹³¹閏三月初三日，士子迎鑾獻賦者，除加恩召試外，所有山西省入學名數，著增廣一次，大學五名、中學四名、小學三名，該學政務須秉公甄錄，¹³²此事乃據嘉慶十三年，巡幸津淀加恩增廣直隸入學名數之例。同日，內閣奉上諭：山西及各省士子迎鑾獻冊，詞采可觀，所有入選者，著加恩賞。¹³³

閏三月初四日，本日召試山西及各省迎鑾士子，試卷山西省共六十四本，外省四十七本，由戴衢亨、王麟、英和、朱理、盧蔭傳等公同校閱，山西擬入選十卷，外省亦十卷，列一等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其考列二等者，各賞小卷緞二件，令充文穎館謄錄。¹³⁴

閏三月十九日，本日呈獻頌冊、畫冊之江蘇附監生楊天璧，賞給小卷五絲緞二件。同日，率領肄業生進呈冊頁之蓮池書院掌教沈兆升，賞給小卷五絲緞袍褂料一套。¹³⁵閏三月二十一日，候選從九品徐梅進獻冊頁，賞給小卷五絲緞一件。¹³⁶

仁宗御製詩文、記文於西巡結束後即著手製成碑刻。晉撫衡齡於四月初十日奉上諭，將御製〈清涼山記〉，及〈五臺贊〉，著於菩薩頂中層庭院內建碑摹勒，碑面刻〈清涼山記〉，〈五臺贊〉勒於碑陰，無庸建蓋碑亭。¹³⁷另外，於直隸境內所作〈御筆隆興寺九言詩〉一首，並溫承惠所進大佛寺原圖一張；嘉慶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由軍機處行文該督，接奉後摹勒於隆興寺。¹³⁸四月十二日，上諭：蓮花池、關帝廟匾額茲已書就，著發交溫承惠敬謹裝潢妥為懸掛。¹³⁹

131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24-125。

132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26。

133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29。賞給：小卷五絲緞二件，其次入選者著加恩各賞給小卷寧絢一件。

134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33。

135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56。

136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66。

137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92。關於碑刻形式為：「仿照高宗御碑尺寸，一面採石製造，一面將碑面寬長尺寸繪圖覆奏，俟頒發御筆到時再行開工上石」。

138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94-195。

139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95。

康熙年間纂《清涼山新志》，乾隆年間亦增纂《欽定清涼山志》，時尚未舉行高宗第六次西巡，故仁宗於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初七日諭：將歷次巡典尚未全載之處，及本次初次蒞臨之各項事宜亦不應失載，著交文穎館，續行纂輯；並著山西巡撫飭地方官將前書未載之廟宇、行宮，及經由道途繪具圖說咨送該館。¹⁴⁰

（二）問俗：獻書及叩閣案件

國家舉辦西巡已是公開訊息，而敬獻冊文有獲得封賞的機會，也為士人習知，然而西巡途中發生二起獻書案件，係因旗人所獻書冊不符清朝的文化政策，是意外插曲。直隸正紅旗滿洲阿勒金布，「妄編漢字書詞，援引稗官野史語句，在道旁跪獻，並求為之傳世，未將廟諱字樣敬避。」據旗人阿勒金布供稱：

正紅旗滿洲，林生阿佐領下人，駐防馬甲，年五十三歲，素日常看《道書全集》及《西遊記》，悟出儒釋道三教會同之理，自作《三教會元清語圖書》五卷，「清語」係精氣神三清之語，「圖書」二字是我自己書寫之意，總是發明一貫的道理。因恭迎聖駕在道旁跪獻，是要求皇上將此書傳世的意思，至我書上有廟諱字樣，實係不知，所以未能敬避。……我所悟的道理非他人所能通曉，實無人與我講究，我來呈獻時，城守尉景溫泰、防禦多爾濟、驍騎校長春並不知道，若向告知必行攔阻，此書係我自己書寫。¹⁴¹

據阿勒金布所言，反映了無所不在的民間信仰，以及寶卷、小說類圖書，確實廣泛流佈，深入旗人社會。雖然嘉慶年間曾禁止小說，即使旗人也普遍閱讀。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十九日，諭令首先指出旗人本分在於學習清語騎射，著交直督溫承惠，將阿勒金布先在營枷號一個月示眾，滿日發往黑龍江，失察之城守尉、防禦、驍騎校則交部議處，該三員參與西巡閱兵應得賞項均著扣除，遭到了連帶懲處。

另一案為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直省境內盤獲「女扮男粧」二人持書本欲行叩閣一事。¹⁴²據刑部所訊，江寧駐防前鋒圖瓦恰那之妻傅關氏，並伊女貞玉，扮成男粧在道旁呈遞書冊。據供：該氏素奉神明，自嘉慶八年起，商量撰出「祥瑞書」

140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37-138。

141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57-158。

142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67-170。

兩本，私自來京呈獻，希圖恩典，伊夫並不知情。上諭指示：既然為日已久，伊夫豈全無聞，著兩江總督勒保據實查明具奏，該前鋒即實無知情故，亦當按律治以應得之罪。

叩關案件自嘉慶十六年閏三月起發生連續數起，¹⁴³叩關者或有冤情，程度不一，通常當日即進行審訊，亦得有諭旨，叩關之人即使申冤有理，亦多半治以衝突儀仗之罪。閏三月十四日，仁宗駐蹕正定府隆興寺行宮，沿途民婦夾道歡迎有數萬人之多，而無控訴之事且整齊嚴肅，風俗淳樸可嘉。¹⁴⁴然而，次日便有二起叩關案件：河南內黃縣人安聘清，呈控捕役誣良詐贓事；¹⁴⁵正定府元氏縣人田文光，呈控本學教官討索棚規贄儀，復遭褫革生員資格事。¹⁴⁶下民申情之事，並不能止息。

五、西巡活動期程

清仁宗自嘉慶十六年三月十八日自圓明園起鑾，於閏三月初一日進入五臺山區，是日駐蹕白雲寺，閏三月七日，自五臺山回鑾，閏三月二十五日返抵圓明園。皇上自圓明園啓蹕至長城嶺，共六百八十一里。自長城嶺回鑾至圓明園共八百五里。¹⁴⁷駐蹕五臺山一帶僅六日，而周折往返近需二個月。此期間的詳細日程，必須以《西巡盛典》、《五臺圍檔》為基礎，比對《起居注冊》、《清實錄》及有關檔案，才能瞭解周全。

（一）《西巡盛典》

此書為巡幸之後所編，其中卷十二至十六為〈程途〉五卷。卷十二，內含上諭及奏摺各十篇，上諭時間自嘉慶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至嘉慶十六年四月初十日；奏摺十

143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30-131、134、135、146、155、166、170-171。

144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49。諭曰：「溫承惠賞還頭品頂戴，前得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之案，著改為四年。以示獎勵。」

145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51。

146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51-152。

147 《西巡盛典》，卷二十，歌頌，頁 33a、36b，據安徽舉人龍汝言〈恒春堂慶典賦〉，詩注。

篇只有奉硃批日期，時間自嘉慶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至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一日。這些上諭、奏摺雖不全面，但可與現存摺件、上諭檔等資料互補。

卷十三至十六有各站次、行宮、尖營、名寺之圖及圖說。圖中載明各站行經里程數，比對來回站次，更清楚顯示行經路線不同，內容如下略述。

卷十三，圖說載明自圓明園起鑾至長城嶺，共十三站；所有行宮、尖營及座落之名稱、里程，所經重要山川地貌、古蹟勝景及先帝事跡具載。直隸境內起行日程，參見表三；及圖 8 第一站、圖 9 第八站。

卷十四，圖說具載五臺山名勝，包括：清涼山全圖，以及東、西、南、北、中臺頂名勝、湧泉寺尖營、臺麓寺行宮、漢河村尖營、白雲寺行宮、臺懷鎮行宮等。

卷十五，圖說具載名寺名勝，包括：鎮海寺（章嘉呼圖克圖塔）、殊像寺、菩薩頂、大螺頂、金剛窟、普樂院、羅睺寺、顯通寺、塔院寺、玉華池、壽寧寺等。拜廟日期參見表四；例舉鎮海寺、普樂院、塔院寺三圖，見圖 10-12。

卷十六，圖文具載自長城嶺座落回程至圓明園，共十五站之行宮、尖營及座落之名稱、里程，沿途重要地景、名勝及先帝事跡。回鑾日程參見表五，及圖 13 第一站。

（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五臺圖檔·嘉慶十六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五臺圖檔》為軍機處檔冊，一冊，內含滿漢文奏摺、諭旨、咨文等共四十九種，其中滿文諭旨、奏章共二十二件。此檔冊包括嘉慶十六年二月至閏三月間重要諭旨、奏章及人員賞賜物件清單，內容雖不若《上諭檔》、《西巡盛典》所載內容類別，仍可互補利用，尤其載入滿文原文，及完整清單內容，為其他、官書檔案所不載，軍機大臣、軍機處許多奏摺、咨文原件均以滿文行文，此檔冊目次參見表六，及滿漢文圖版 14-1、14-2、14-3。

這些重要史料提供特殊訊息，包括仁宗拜廟日程及活動；籌備西巡支出項目、經費記載較為詳細；由賞單所示僧人、喇嘛人數，可見五臺山寺院其時之規模。相較於《西巡盛典》所載，同樣是〈擬賞扈從王大臣、侍衛、官員等名單〉（嘉慶十六

年閏三月初二日)，《西巡盛典》只收入賞賜物件，並無受賞者職名，必須參看《五臺圍檔》。前述籌備馬匹項目，仁宗西巡改變原訂比照乾隆年間舊例，其滿文原件即載入《五臺圍檔》。

六、宗教認知

除了上述西巡動機含有關宗教與閱武結合的理想性之外，有需要注意仁宗自己表達的宗教認知，進而了解仁宗西巡與乾隆朝的差異。

仁宗所做西巡詩賦中，有四首較具宗教意涵。其一為：〈恒春堂〉（恭依皇考辛丑詩韻）。恒春堂在臺懷鎮行宮，又名菩薩頂行宮；乾隆二十五年，改建正殿五楹，正中高宗題額曰：「恒春堂」。¹⁴⁸〈恒春堂〉詩文及詩注曰：

在天慧日照恒春，住世度參出世因。（此處行宮居臺山之中，昔我皇考蒞此，洪恩法施，遍滿十方，福果聖因，湛然不寂者，恒垂無量，茲予度參出世佛心，舉為民祈福之典，惠澤普加，即以住世因緣，密證甚深願力，一切有為法原不殊，昔今同異爾。）堂據坡陀眾山繞，藻輝河漢五峰峴。

省耕問俗修巡典，崇儉黜華懷庶民。賜復蠲租遍晉省，新恩仍渙舊恩綸。¹⁴⁹詩文明確將西巡乃為民祈福之動機，基於「度參出世佛心」，另使用「住世」、「因緣」、「密證」、「願力」、「有為法」等宗教語彙。

其二是關於章嘉呼圖克圖的詩句，仁宗著有〈遊金剛窟、普樂院諸勝境〉一詩：

瞻禮黛螺旋，攬轡問巖壑。遙矚嶺若屏，近覩崖如削。聖祖額雁堂，金剛曾住腳。北上境秀奇，皇考顏普樂。昔章嘉國師，瓶鉢時寄託。轉世俗尚延，真幻原無著。黃教馭群藩，深意存遠略。守成凜持盈，心傳敬述作。¹⁵⁰

金剛窟位於東臺，據聞寺內有文殊菩薩置天樂一部。¹⁵¹普樂院為號稱清代四大活佛之一章嘉呼圖克圖所居靜室，¹⁵²乾隆五十一年，三輩章嘉呼圖克圖圓寂後已轉世。

148 《西巡盛典》，卷十五，程途，頁 33b-34a。

149 《西巡盛典》，卷一，宸章，頁 14b-15a。

150 《西巡盛典》，卷一，宸章，頁 16b。

151 《西巡盛典》，卷十五，程途，頁 15b-16a。

152 《西巡盛典》，卷十五，程途，頁 18b-19a。

詩中亦使用「真幻」、「無著」等佛教詞句，表現中觀、般若佛教思想。

仁宗於〈羅睺寺〉一詩中徵引佛典《中阿含經》說明此名來由，羅睺羅原為佛子，後為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者。¹⁵³另有題〈寶塔院〉詩一首，寶塔寺在靈鷲峰下，明永樂中建時曰大寶塔寺，傳說內有佛舍利塔，左有文殊髮塔。¹⁵⁴此寺院即塔院寺，由於寺中所藏，塔內究為何物均屬傳說，故仁宗亦以「志傳雙塔今瞻隻，紺髮存乎舍利存。佛與文殊是一二，鏡花水月總無痕」四句，¹⁵⁵強調不可考的傳說事跡，不必強作考實、助長分別心與「幻住」，主張以常為幻的般若智，這又與〈清涼山記〉：「佛具千相，予惟一心，出世住世，相為表裏，殊途同歸，非二理也」相合。

仁宗詞臣亦將朝廷、佛教，與西巡五臺山做了連繫，認為本朝「祀事修明」，「釋教自漢已彰，而瑞應於今為盛，五臺在法界內獨號清涼，文殊於佛道中斯稱父母」，「不事皈依之末迹，常殷祈福之深情」，¹⁵⁶謁陵、拜廟制度規模確實參考舊例，西巡活動亦符合佛教精神。

相較於高宗西巡詩句所述及的佛典，仁宗在數量、種類上均不及。高宗首次西巡便有〈娑羅樹〉一詩，注明娑羅樹即如意樹，寫明梵語讀音「噶爾布喇瓦喇」，且引用了《涅槃經》。¹⁵⁷

另可據賞賜物件，說明君王的喜好。頒賞物件應全部來自內府，此次賞賜清單相較於乾隆十一年清高宗首次西巡所供（參見表七），仁宗明顯沒有供奉「御書佛經」。乾隆十一年、二十六年、四十六年，均供御書佛經，包括：《御書心經佛塔》、《御書千手千眼佛經》。乾隆五十一、五十七年，所頒佛經有：《妙法蓮華經》、《金剛經塔》、《大悲陀羅尼經》、《文殊菩薩經》等等，參見表八。據《欽定清涼山志》所載，清

153 《西巡盛典》，卷一，宸章，頁 16b-17a。詩云：「試考《阿含經》，我佛原有子。九齡即捨家，竹林留聖水。密行第一稱，禪宗得直指。心印守弗違，人天大歡喜。（《中阿含經》云：佛妻耶輸陀羅生子羅睺羅，九歲出家修行，佛於王舍城竹林迦蘭哆園，留水覆器示以大道，在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是佛之正法眼藏，未嘗不一家相授，而信奉心傳者，其為人天歡喜因緣，真有不可思議者耳。）」

154 《西巡盛典》，卷十五，程途，頁 27b-28a。

155 《西巡盛典》，卷一，宸章，頁 17b。詩注：「寺內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左有文殊髮塔，兩塔今祇存其一，其為佛舍利耶？為文殊髮耶？皆不可考。佛菩薩以法身為幻住，所存者又何足道哉。」

156 《西巡盛典》，卷十九，歌頌，頁 1-44。

157 《欽定清涼山志》（乾隆），卷四，頁 5a-6b。

高宗除乾隆十六年第二次西巡，均供佛經。乾隆五十七年，高宗頒賞「藏經一部」於菩薩頂，應為《大藏經》；回鑾後，獻供滿、蒙、漢、藏四體《文殊師利贊》泥金寫本一分、刻本一百分，參見圖 15。乾隆五十九年，以《大聖文殊菩薩四樣字經》三部供於普樂院，做為此生最後的獻禮。

清高宗歷次西巡所供以佛經、佛像為主，而乾隆五十七、五十九年二次頒賞則宗教供器用品甚多，包括：鍍金鼎爐一座、鍍金燭臺、鍍金花瓶各一瓶、鍍金琺瑯七珍、鍍金琺瑯八寶各一副，琺瑯供器、鍍金供器各五件，琺瑯七珍、八寶瓶蓋供器十七件、洋磁七珍八寶供器二堂三十件、琺瑯五供二堂十件等。

清仁宗西巡所供亦以供器用品為主，包括：數珠、洋磁供碗、供盤、供器、玉蓮花、玉珍供器七件、玉寶供器八件等，參見表九。

候補山西直隸州知州朱錫庚，獻〈藩部獻符文〉一篇，歌頌清帝因重視五臺山，護持佛教，能有效統治廣大疆域，「蒙古藩部世沐湛恩，皈依竺蘭，歲時款塞，頂禮靈山，鱗集而輻湊」，並以佛教觀點理解自太祖以降至嘉慶今上，均受以佛法，彰顯佛光。¹⁵⁸反映以佛教觀點理解、闡述清朝統治的成功，不限於官方及蒙古族群，在漢人中也出現過。

七、蒙古情感——扈從蒙古王公

（一）扈從蒙古王公名單分析

《五臺園檔》內載有扈從蒙古王公清單，可進一步據以查證個別出身並探討其身份，名單參見表十，考察結果詳下述。

隨從蒙古王公有二位御前大臣：拉旺多爾濟，他是右翼喀爾喀親王固倫額駙，另一位是丹巴多爾濟，職爵為御前行走喀喇沁公。

¹⁵⁸ 《西巡盛典》，卷十九，歌頌，頁 26。

表十 嘉慶十六年西巡扈從蒙古王公名單一覽表

職銜	名字	所屬蒙旗	備註
御前大臣	拉旺多爾濟	喀爾喀賽因諾顏部	嘉慶八年救駕功臣
	丹巴多爾濟	喀喇沁部	同上
御前額駙	瑪呢巴達拉	土默特部	
御前行走蒙古王公	噶勒藏棟羅布	科爾沁部	
	布彥溫都爾琥	科爾沁部	
	索特那木多爾濟	巴林部	
	滿珠巴咱爾	喀喇沁部	
	巴勒楚克	奈曼部	
	巴彥濟爾噶勒	喀爾喀賽因諾顏部	拉旺多爾濟之子
	瑪哈巴拉	喀喇沁部	

資料來源：《五臺圖檔》，頁 23-27，〈擬賞王大臣侍衛等貢鈔等物單〉；《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第二輯；《欽定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咸豐朝）。

資料說明：《五臺圖檔》所載清單內尚有御前侍衛八人，乾清門行走二十九人，內或有蒙古貴族出身者，尚待查核。

拉旺多爾濟屬喀爾喀賽因諾顏部，元太祖裔。其祖策凌於康熙、雍正年間抵禦準噶爾部東進，已著有軍功；康熙四十五年，尙和碩純愨公主；雍正元年，特封多羅郡王，九年，晉和碩親王，授喀爾喀大扎薩克；十年，賜號超勇；乾隆十五年，去世諡襄，配享太廟，入祀賢良祠。策凌長子成袞扎布，襲扎薩克和碩親王；乾隆二十一年，討平青衮咱卜之叛。乾隆三十六年，成袞扎布第七子拉旺多爾濟二次襲；尙固倫和靜公主，尋封世子，命御前行走；四十六年，詔世襲罔替。¹⁵⁹

丹巴多爾濟屬喀喇沁部，八次襲扎薩克鎮國公固山貝子。初封色梭，天聰八年（1634）始，隨大軍征明朝、喀爾喀等，子孫從征入關，頗有軍功。¹⁶⁰曾授乾清門侍衛喀喇沁公，至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前，已晉扎薩克貝勒。¹⁶¹

拉旺多爾濟、丹巴多爾濟二人與皇室結為姻親，地位自然不同。另一西巡隨從王大臣定親王綿恩，為仁宗親姪。此三人和仁宗有特殊關係，即在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日的紫禁城遇刺事件，他們是救駕功臣。

159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卷十，表十，喀爾喀賽因諾顏部，〈扎薩克和碩親王〉，頁 88；卷七十，傳五十四，〈扎薩克和碩超勇襄親王策凌列傳〉，頁 481-488。

160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卷二，表二，喀喇沁部，〈扎薩克鎮國公今襲固山貝子〉，頁 14-15；卷二十四，傳八，〈扎薩克鎮國公色梭列傳〉，頁 190-195。

161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三七，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庚戌。內有扈從蒙古王公屬部及職名。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日，仁宗自圓明園回皇宮齋戒，經神武門，於花園內換轎已入順貞門，入門前有一男子名陳德，手持小刀自神武門內西廂房南山牆後衝出，直奔御轎，「定親王縣恩首先奮力推卻，衣被浮傷，固倫額駙親王拉旺多爾濟、御前侍衛丹巴多爾濟、珠爾杭阿、紮克塔爾、桑吉斯塔爾同擒逆犯，即時就縛」，皇上於宮中遇刺，為清朝開國以來未有之事，「丹巴多爾濟身被三傷，實堪嘉尚，是以超封貝勒，縣恩等俱分別加恩矣」。當時侍衛、各差人員有百餘人，均袖手旁觀，漠視不救，唯拉旺多爾濟等六人費力擋下刺犯。¹⁶²

御前行走蒙古親郡王名單內，首列二人為科爾沁部親王，前者為科爾沁和碩卓哩克圖親王，噶勒藏（桑）棟羅布，¹⁶³後者為科爾沁扎薩克和碩達爾汗親王，布彥溫都爾瑚（八次襲），¹⁶⁴另有巴林扎薩克親王銜郡王索特納木多爾濟；喀喇沁扎薩克親王品級銜多羅郡王滿珠巴咱爾；奈曼一等台吉巴勒楚克，¹⁶⁵共五人。嘉慶十五年十一月，仁宗特頒諭旨安排科爾沁二位親王扈從：

明年三月十八日，自京起鑾巡幸五臺，所有隨從之御前行走蒙古王公內，科爾沁親王噶勒藏棟羅布、布彥溫都爾呼等二人，游牧處所距京較遠，若伊等仍於本年年班來京，照例明年正月遣回，及至游牧地方所住不過數日又需來京，往來僕僕，未免過勞，所有噶勒藏棟羅布、布彥溫都爾呼今年

162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百九，嘉慶八年閏二月乙丑，諭旨。

163 《欽定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咸豐九年敕修，續修四庫全書本，冊473），表一，科爾沁部，卷一，頁四。

164 《欽定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續修四庫全書本，冊473），表一，科爾沁部，卷一，頁3。

165 後三人之出身、品級，可參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千四百九十七，嘉慶二年七月至十二月乙丑，太上皇帝同皇帝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名單；《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二七，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庚戌。索特那木多爾濟襲次參見《欽定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卷二，頁6；祖上世系世蹟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卷三，表三，巴林部，〈扎薩克多羅郡王今襲親王品級〉，頁21-22；卷二十八，傳十二。索特納木多爾濟世系事蹟參見：〈巴林部總傳〉、〈扎薩克多羅郡王色布騰列傳〉，頁221-225。滿珠巴咱爾世系事蹟參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二，表二，喀喇沁部，〈扎薩克多羅杜梭貝勒〉，頁13，九次襲；卷二十三，卷七，〈扎薩克多羅杜梭貝勒固魯思奇布列傳〉，頁185-188。奈曼部巴勒楚克，襲次參見《欽定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卷二，頁5；祖上世系世蹟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奈曼部，卷三，表三，〈扎薩克多羅達爾漢郡王〉，頁21；卷二十七，傳十一，〈奈曼總傳〉、〈扎薩克多羅達爾漢郡王袞克列傳〉，頁215-218。

年班，加恩著不必前來，俟明年三月初來京隨朕前往，將此旨著理藩院由四百里馳驛傳知。¹⁶⁶

蒙古王公按年輪流固定排班進京，稱為年班，科爾沁親王噶勒藏棟羅布、布彥溫都爾呼二人嘉慶十五年底適值年班，考量若仍照班來京，明年正月復返回本旗，三月又需扈從西巡，往返過勞，故諭理藩院儘速傳知是年底年班暫停。

御前行走名單內有二人，首列巴彥濟爾噶勒，即前述固倫額駙喀爾喀親王拉旺多爾濟之子，嘉慶八年受封輔國公，後襲爵扎薩克和碩親王。¹⁶⁷另一人為喀喇沁輔國公瑪哈巴拉。¹⁶⁸御前額駙一員，是為土默特部貝子額駙瑪呢巴達拉，元太祖裔。¹⁶⁹

在西巡回程途中，軍機處會同拉旺多爾濟、丹巴多爾濟，向蒙古王公噶勒藏棟羅布等六人傳述，令於大教場請安之後，即由易州提早回遊牧地；隨後據噶勒藏棟羅布等僉稱，隨聖駕出巡理應扈從到京，由易州一帶行走不過早到數日，寧願隨聖駕

166 《嘉慶帝起居注》，冊 15，頁 504，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此段譯漢上諭，另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嘉慶朝起居注冊》，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丙辰；唯院藏滿文本《嘉慶朝起居注冊》並未寫入。此則滿文上諭可見於《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97184，「移會·諭科爾沁親王本年毋庸來京由／十一月二十九日」。滿文轉寫：saicungga fengšen i tofohoci aniya omšon biyai ice sunja de/ hese wasimbuhange, mini beye ishun aniya ilan biyai juwan/ jakūn de gemun hecen ci jurafi u tai šan alin de/ enggelenere de dahame, genere gocika de yabure monggo wang/ gung sei dorgi korcin cin wang galdzangdungrob, buyan undurahū juwe niyalmai nukte gemun hecen ci sandalabuhange/ goro, esebe aika na i ere aniya aniyai idu de/ jibufi kooli songkoi ishun aniyai aniya biyade amasi/ maribuci nukte de isinatata manggai udu inenggi tefi/ geli gemun hecen de jitere be baibumbi. esei amasi/ Julesi yabure de morin ulha be jobobure be akū/ obume muterakū, kesi isibume galdzangdungrob, buyan undurhū be ere aniya aniyai idu de jidere be/ joo, ishun aniya ilan biyai juwasime gemun hecen de/ jibufi mimbe dahame jurakini, ereb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ci emu inenggi duin tanggū ba bilafi □ ulhibume yabubu sehe.：此件移會本文為：「兵部為移會事。車駕司案呈，十一月初五日內閣抄出科爾沁親王本年毋庸來京，奉清字諭旨一道，相應恭錄移會貴處查照可也。須至移會者。計粘單一紙。右移會／稽察房」。滿文轉寫：coohai jurgan i bithe, kamcime baicara bade unggihe sakini/ sere jalin morin sejen i belhere fiyenten alibuhange, omšon biyai/ ice sunja de dorgi yamun ci sarkiyame tucibuhe korcin cin/ wang ere aniya gemun hecen de jidere be baiburakū joo,/ dergi hese emu afaha erebe gingguleme arafi suweni bade sakini/ seme yabubufi baicame icihiyabuki □ seme alibuhabi, ere/ jalin unggihe.。

167 四次襲，參見《欽定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卷八，頁 4。

168 瑪哈巴拉族系事蹟，參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卷二，表二，〈扎薩克一等塔布囊今封輔國公〉，頁 15；卷二十四，傳八，〈扎薩克一等塔布囊格呼勒列傳今封輔國公〉，頁 195-196。

169 瑪呢巴達拉（喇）襲次參見《欽定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卷一，頁 31。其世系事蹟見《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卷二，表二，土默特部，〈扎薩克固山貝子〉，頁 17；卷二十五，傳九，〈土默特總傳〉、〈扎薩克固山貝子固穆列傳〉，頁 198-204。

行走，俟到京後再回遊牧地，所多時日有限，且天氣不甚熱，滿珠巴咱爾計算四月底五月初查圍之期，不至遲悞。蹕路程途較近，每日隨行數十里，馬匹不致疲乏，如各自趨程，馬匹易疲，亦恐不能早到。軍機處臣工等察其情詞真切，故代為奏聞。¹⁷⁰

（二）隨從蒙古王公名單之外——蘊端多爾濟

除上述隨從蒙古王公之外，亦有原命扈從後因故未能前往者，即是庫倫辦事大臣蘊端多爾濟。蘊端多爾濟未曾名列扈從名單內，由現存《內閣大庫檔案》所存檔案，可知此事。仁宗早將蘊端多爾濟納入扈從蒙古王公名單，反映此人有一定的重要性。關於蘊端多爾濟確實曾接受諭令隨往五臺山的記載，僅見於《內閣大庫檔案》嘉慶十五年十一月滿文檔案，漢譯如下：

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奉旨，蘊端多爾濟曾奏請於今年年班來京朝覲聖明，適才諭令御前行走王公噶勒藏棟羅布、布彥溫都爾呼，因遊牧程途遙遠，今年年班著停止前來，明年來京隨往五臺山。蘊端多爾濟亦御前行走之人，庫倫距京路程遙遠，此旨抵庫倫，蘊端多爾濟再起行來京亦趕行不及，將此曉示蘊端多爾濟，今年內尚不必請求來見，索性明年二月，俄羅斯若無任何消息，蘊端多爾濟再自庫倫起行，經驛傳於三月初來京，隨往五臺山；若俄羅斯處派出使臣，一有進京消息，蘊端多爾濟即在庫倫妥貼辦理，勿庸到京。¹⁷¹

170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6，頁 139。

171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93877，「移會·蘊端多爾濟隨往五臺山由／十一月二十九日」。滿文轉寫：saicunga fengšen i tofohoci aniya omšon biyai ice uyun de/ hese wasimbuhan gge yundundorji i baci ere aniya aniyai idu de gemun hecen de jifi/ mini genggiyen be hargašanjire be baime wesimbuhabi, jakan gocika de yabure galdzangdungrob, buyan undurhū nukte i jakūn goro ofi ere aniya aniyai idu de jidere be ilinjafi/ ishun aniya gemun hecen de jifi mimbe dahame u tai šan alin de genekini seme hese/ wasimbuha bihe, yundundorji inu gocika de yabure niyalma kuren gemun hecen ci/ sandalabuhangge jukūn i goro ere hese kuren de isinatala yundundorji jai/ jurafi gemun hecen de jici inu amcame muterakū, erebe yundundorji de/ ulhibufi imbe ere aniyai dolo hono amcame jidere be baiburakū/ inemene ishun aniya i juwe biyade oros aika ai mejige akū oci/ yundundorji jai kuren ci jurafi giyamun ula deri ilan biyai juwasime/ gemun hecen de jifi imbe dahame u tai šan alin de genekini aika oros baci/ elcin takūrafi gemun hecen de dosimbure mejige bici yundundorji uthai/ kuren de saikan icihiyame šuwe gemun hecen de jidere be joo sehe. 此件移會本文為：「兵部為移會事。武選司案呈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內閣抄出蘊端多爾濟隨往五臺山奉諭旨一道，相應抄單移會貴處可也。須至移會者。計粘單一紙／右移會稽查房／嘉慶十五年十一月日／主政富」。

上諭指示蘊端多爾濟關注俄國使臣，除非至次年二月確知俄方並無消息，方可起行至京隨從五臺山。接二連三的對外事務，應是耽誤蘊端多爾濟不能隨行的原因。

先前蘊端多爾濟即曾奏俄國邊防要務。嘉慶十五年三月，蘊端多爾濟奏稱與俄國官員於恰克圖交界商議，俄方議請清廷遣派使節赴俄，為朝廷斷然拒絕。¹⁷²同年六月，蘊端多爾濟奏將喀爾喀四部落與俄羅斯設卡駐守稽察之章京，量加鼓勵；奉旨俄羅斯交界地方所設卡座最為緊要，該扎薩克公及官兵等每班駐守五年，如果稽察嚴密，該卡座並無盜賊等事，自應獎賞。¹⁷³

御前行走蘊端多爾濟，在官書、檔案裡亦有異寫成雲丹多爾濟。他出身自顯赫的元太祖裔，喀爾喀土謝圖汗部。初封為西第什哩，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弟，康熙三十年封扎薩克多羅貝勒。第一次襲為西第什哩次子丹津多爾濟，雍正元年，晉和碩親王。二次襲為丹津多爾濟孫桑齋多爾濟，乾隆三年，襲扎薩克多羅貝勒。三次襲為桑齋多爾濟長子蘊端（雲丹）多爾濟。初受一等臺吉，「教養於內庭」。乾隆四十二年，命乾清門行走，賜孔雀翎。乾隆四十四年，蘊端多爾濟襲扎薩克多羅郡王，命御前行走，賜三眼孔雀翎，是年扈駕木蘭行圍，賜黃馬褂。尋尚郡主，授多羅額駙；四十六年，詔世襲罔替。¹⁷⁴

其初授「御前行走」之時尚年幼，而教養於內庭，係指在阿哥書房內讀書。¹⁷⁵因此，可能自幼即和清仁宗同窗學習，此後又成為皇室姻親。¹⁷⁶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清高宗認為蘊端多爾濟在庫倫學習辦事將及一載，且係御前行走郡王，諭令嗣後具奏，將職銜名列勒保之前。¹⁷⁷自此，蘊端多爾濟多年來處理庫倫事務，¹⁷⁸嘉慶年間

172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二十七，嘉慶十五年三月辛酉。

173 國立故宮博物院，《起居注冊》，嘉慶十五年庚午六月上初三日丙戌。另參《嘉慶帝起居注》，冊15，頁239。

174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七，表七，〈扎薩克多羅貝勒今襲多羅郡王〉，卷四十九，傳三十三，〈扎薩克多羅貝勒西第什哩列傳〉收入《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頁57、356。

175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千七十七，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下己卯。

176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千一百四十七，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下丁酉，保和殿筵宴名單，內寫做「多羅郡王多羅額駙蘊端多爾濟」。

177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千一百九十五，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下丙子。

178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千二百四十，乾隆五十年十月上丁丑朔，「諭：庫倫現在無事，勒保駐彼亦久，勒保、松筠俱著回京，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所有庫倫事務，即著副都統佛住駐彼會同蘊端多爾濟妥協辦理」。《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千三百七十五，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下癸巳。上諭蘊端多爾濟等奏俄羅斯請通貿易等事。《清實錄·仁宗睿皇帝

曾任喀爾喀貝子土謝圖汗幫辦將軍、¹⁷⁹庫倫辦事大臣，¹⁸⁰尤其是俄羅斯事務。中俄關係事務繁重，仁宗西巡回鑾之後，嘉慶十六年四月，蘊端多爾濟奏稱俄人懇請遣人探望伊之喇嘛及學生，并齎送盤費等事，爲理藩院以事不合例飭回。¹⁸¹

然而，蘊端多爾濟或許心有遺憾，乃擅自派伊子，御前乾清門行走多爾濟喇布丹，於年班外來京入覲，起行後方行奏報，一面具奏一面即令伊子起程，因行爲冒昧遭到申斥。¹⁸²

八、清帝西巡與政教關係

清代皇帝與宗教領袖的密切互動關係，五臺山成爲他們互動的重要場所之一。自清聖祖至清仁宗，包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章嘉呼圖克圖等，後者具有「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的稱號，十分受到皇帝的重用。三輩章嘉呼圖克圖若必多吉（1716-1786）自乾隆十五年至五十一年三十六年之間，幾乎每年夏季四月至八月均於五臺山修行傳法；乾隆十五年、四十六年亦隨往五臺山。¹⁸³《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的作者土觀胡圖克圖·洛桑卻吉尼瑪是章嘉呼圖克圖的首要弟子之一，此傳記於嘉慶三年刻印，成爲反映乾隆時代政教關係的重要典籍。¹⁸⁴內文記載章嘉呼圖克圖曾於五臺山之善財洞、金剛窟、菩薩頂等地禪修；清高宗亦賜建普樂院供其修行；他不分晝夜在五臺山修行，還留有詩讚曰：「吉祥妙金剛化現之地，清涼須彌勝境五臺山，具足功德的密嚴刹土，諸部佛陀會集的地方」、「減輕了塵障的具緣者，由信仰明鏡脫離邪見，文殊菩薩以護持之力，顯現各種奇特的幻身」等等，表達了

實錄》，卷四十五，嘉慶四年五月下丁亥。上諭蘊端多爾濟等奏請於俄羅斯邊界卡倫請旨派員，不時巡邏等事。

179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百二十八，嘉慶九年四月丁亥。

180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十八，嘉慶十四年九月癸未。

181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四十二，嘉慶十六年四月丙辰。

182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五十，嘉慶十六年十一月甲申。

183 馬連龍，〈三世章嘉國師駐錫五臺山事略〉，《五臺山研究》，20（1989：3），頁 35-38；蕭寧，〈章嘉呼圖克圖與五臺山佛教〉，《五臺山研究》，25（1990：4），頁 11-15。

184 （清）土觀胡圖克圖·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後記〉，頁 374。

五臺山做為佛教聖地的不凡境界。¹⁸⁵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初二日，三輩章嘉呼圖克圖圓寂，高宗為其造佛塔於五臺山鎮海寺。

四輩章嘉呼圖克圖伊希丹畢堅贊（1787-1846），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五月十八日於青海宗喀轉世，八歲時至京朝覲清高宗；十一歲時來京朝晤高宗，仁宗對其「親愛愈恒」。¹⁸⁶前述清仁宗著有〈遊金剛窟、普樂院諸勝境〉一詩，便直接將「黃教」與蒙古藩部連結，喻為章嘉呼圖克圖之功蹟。清仁宗此次西巡最主要的宗教領袖仍是四輩章嘉呼圖克圖，及駐京呼圖克圖之一的噶勒丹錫呼圖呼圖克圖。他們在菩薩頂念經三日，從受賞清單可知見此法會規模宏大。

湖北監生葉志詵著〈大千普福詩〉一首，歌頌仁宗西巡並表達關於本朝與五臺山關係的看法：

印度峰高驚（靈鷲峰為五臺中山正與西印度符合），香山像肖獅（臺山殊像寺有文殊跨狻猊像，高宗純皇帝西幸摹圖，以歸建寶相寺於香山南，命工依像裝塑，聖製寶相寺詩有蓮臺高建禮曼殊之句）；生蓮皆彼岸，納芥盡須彌；舍衛城應爾，耆闍崛在斯。¹⁸⁷

詩中顯示出不但瞭解清高宗曾經仿塑、仿建五臺山殊像寺於北京香山寶相寺之事，還強烈表示五臺山就是印度、就是佛境的認知。

錫林郭勒盟阿巴哈納爾左翼旗的蒙古史家，納塔（扎薩克固山貝子袞布旺札勒），於乾隆五十七年至道光七年間，編寫了一部蒙古史《金蔓》，其內容大量敘述成吉思汗先祖以降，至元、明、清的蒙古政教歷史，尤其以蒙、滿、藏之宗教關係為宗旨。¹⁸⁸此書也可以反映清朝中期，蒙古視野下的五臺山與清政權的關係。納塔記述清朝入關的經過：

順治元年（1644）四月，睿親王多爾袞命令集結全部兵力，以平定中國之亂事，其時，流寇李自成劫掠北京城，吳三桂請兵之故，睿親王親入山海

185 《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頁 302-306。

186 三輩、四輩（第十五世、十六世）章嘉呼圖克圖生平見妙舟法師，《蒙藏佛教史》，頁 100-102。

187 《西巡盛典》，卷二十四，歌頌，頁 40，湖北監生葉志詵，〈大千普福詩（五言排律一百韻謹序）〉。

188 包文漢、喬吉編著，《蒙文歷史文獻概述》，頁 166-172。

關迎擊流寇，使李自成往西北敗走了。其後，明朝眾多官員於五臺迎審親王；五月，進入京城。¹⁸⁹

在五臺山迎接清朝統治者固然不是歷史事實，然而，明清政權易代的重要時刻與「聖地」連結，則具有重要意義，尤其這個觀點出於薦信佛教的蒙古族群。

在西藏佛教圈裡，最重要的聖地，莫過於達賴喇嘛駐地所在——拉薩，雖然清高宗已於乾隆三十二年，於承德仿拉薩布達拉宮建造普陀宗乘之廟，又於乾隆四十五年，仿日喀則班禪額爾德尼駐所扎什倫布寺，建造須彌福壽之廟，將西藏、衛藏最重要的宗教元素移植於清朝新興的宗教中心，然而，承德外八廟固然寺院群宏偉、壯觀，畢竟沒有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地位如此崇高的宗教領袖，而五臺山自唐代起，即具有東亞聖地的地位，明清以來，漢、藏佛教均十分盛行，地位不下於藏地，且乾隆年間，章嘉呼圖克圖常年駐錫該地，吸引廣大信徒，在滿洲政權的護持之下，聖地與聖僧結合，強化原有雄厚之宗教歷史底蘊。因此，清仁宗明確地訴諸文字，將五臺山譬喻為「中華衛藏」，誠有其所以然。

結 論

清朝自順治年間即開始重視五臺山，多次舉辦西巡，清仁宗效法父祖西巡的機動是明顯存在的，有其正當性；而五臺山具有西藏一般的地位，亦是百年來積累的結果。觀察仁宗西巡始末可知決定西巡的動機與籌辦過程，發現當時有多種考量，並非僅是「為民祈福」而已，西巡活動結合多項因素，包括：宗教、孝思、崇文、閱武、觀風，及蒙古情感，尤其伴隨著皇帝大營的千軍萬馬，及隨從文武官員、藩部貴族，表現滿洲統治特色的政治文化。

清仁宗親政後清朝正式進入「後乾隆時代」，他接續前朝工作，總結歷次巡典的要旨在於：「敬闡前謨，省方問俗，崇文習武，戒逸力勤，斯皆巡典之大要也」；西巡籌辦過程，態度謹慎，嚴禁奢華浮費。似乎也只有舉辦巡幸大典，才能全體動員，同時對中央與地方進行檢驗，尤其考驗直隸、山西二省的配合能力。巡典本身並非

189 (清)納塔，喬吉校注，《金鬘》，頁 58-59。

貫常制度，且需費浩繁，仁宗必須考量時勢，並確實以堅強意志貫徹執行。

仁宗將乾隆刊本《欽定清涼山志》未收乾隆五十七年第六次西巡，補入增修，又將嘉慶十六年西巡編成《西巡盛典》，使清代的巡幸典籍更為完備。唯於御製序文中提及本次西巡與其他巡幸的連繫性：「敬溯聖祖《幸魯盛典》，高宗《南巡盛典》，奚能彷彿於萬一」，反映了仁宗西巡只是守成、續行而已。西巡告成後，仁宗未曾再議，連修繕五臺山之奏報亦甚少。¹⁹⁰

清仁宗雖效法皇父舉行西巡，然而，對聖祖當年曾經幾次西巡，似已不復記憶。清聖祖五次西巡，關於後兩次，乾隆年間新修《欽定清涼山志》先失載，¹⁹¹又於清仁宗敕修《西巡盛典》內闕收：《西巡盛典》凡述及聖祖巡幸五臺山之處均載西巡三次。¹⁹²將康熙年間的巡幸活動失載的原因，可能僅根據乾隆年間《欽定清涼山志》，並未確實查證，有如集體失憶。

雖然仁宗在佛教經典、宗教器用的使用和興趣上與高宗不同，然至十九世紀初期，清人對「滿洲」一詞與「文殊菩薩」、「曼殊師利」的連繫已十分自然，佛教政治依然有表現場域。五臺山由於仁宗西巡再次確定其「聖地」地位，加上自乾隆年間成為章嘉呼圖克圖駐地之後，以轉世維繫「聖僧」系統，與蒙古觀點——政權聖地化相呼應。總之，五臺山能做為「中華衛藏」，也是一番努力維持的成效。

190 嘉慶十六年以後，僅嘉慶二十二年十月，有一則〈山西巡撫和舜武為查勘五臺山工程事片〉收入〈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下）〉，《歷史檔案》，84(2001.4)，頁35。

191 康熙年間所修《清涼山新志》，內有康熙四十年五月初三日所寫〈御製序〉，因此未載入四十年之後的西巡活動。《欽定清涼山志》（故宮珍本叢刊，冊248），卷七，〈巡典（恩賚附）〉，頁1-5。此志無御製序文，內文所載巡幸年分止於康熙三十七年，而其後有康熙四十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發內帑修繕寺院、頒賜經書之事，後二次西巡事蹟闕載。乾隆年間《欽定清涼山志》事載至乾隆五十一年第五次西巡，纂修臣工所書按語，亦寫明「聖祖仁皇帝問俗省方，法駕三駐」，《欽定清涼山志》，卷七，頁11a。

192 《西巡盛典》，〈御製序〉，頁2b-3a，「聖祖仁皇帝巡幸三次、遣使七次」；卷七，〈續後〉，頁10b，龍汝言作〈清涼山賦〉，有「紀聖祖之三臨」之句；卷八，〈續後〉，頁9a，李堂棟亦有「聖祖備三巡之典」之句等等。

表二 乾隆五十七年清高宗五臺山拜廟行程一覽表

月日	起站	里數	寺廟、行宮	備註
3.22	白雲寺行宮	16	殊像寺	
	殊像寺	3	菩薩頂	
	菩薩頂	3	臺懷行宮	共 22 里
3.23	雪			
3.24	臺懷行宮	半	塔院寺	
	塔院寺	1	顯通寺	
	顯通寺	半	羅睺寺	
	羅睺寺	1	臺懷行宮	共 3 里
3.25	臺懷行宮	3	菩薩頂	
	菩薩頂	3	壽寧寺	
	壽寧寺	9	玉華池	
	玉華池	9	臺懷行宮	共 24 里
3.26	臺懷行宮	6	大螺頂	
	大螺頂	6	臺懷行宮	共 12 里
3.27	臺懷行宮	1	殊像寺	
	殊像寺	10	鎮海寺	
	鎮海寺	8	白雲寺行宮	共 19 里

資料來源：《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15，頁 107-108。

資料說明：普樂院為章嘉呼圖克圖居所，乾隆五十一年以前俱經駕幸拈香，呼圖克圖圓寂後即停止臨幸。

表三 嘉慶十六年西巡起行日程一覽表（直隸境內）

月日	站次	是日起點	中伏處	駐蹕地	重點景觀
3.18	1	圓明園	夏莊尖營、新店尖營	黃新莊行宮	永定河、蘆溝橋、河神廟
3.19	2	黃新莊行宮	俞家莊尖營、韓村河尖營	半壁店行宮	大房山
3.20	3	半壁店行宮	石亭尖營、魏村尖營	秋瀾行宮 (謁秦陵駐蹕)	石經山、雲居寺
3.21	4	秋瀾行宮	安河座落	梁各莊行宮	堯山、往來秦陵孔道
3.22	5	梁各莊行宮	西正峪尖營、南石門尖營	東北溪大營	秦陵、秦東陵、秦寧山、黃金臺、荊軻山
3.23	6	東北溪大營	涞山村尖營、范村尖營	隆山村大營	紫荊嶺
3.24	7	隆山村大營	王各莊尖營、五侯村尖營	五郎村大營	五公城、木蘭祠
3.25	8	五郎村大營	莊裏村尖營	東都亭大營	堯城村、堯母祠、堯山
3.26	9	東都亭大營	靈濟祠座落	隆村大營	柏巖山
3.27	10	隆村大營	赤澗橋尖營、槐樹塢尖營	王快鎮大營	北嶽廟
3.28	11	王快鎮大營	張家莊東尖營、普佑寺座落	法華村大營	阜平縣、大茂山
3.29	12	法華村大營	靈應庵尖營	大教場行宮	北山、銀河山
3.30	13	大教場行宮	招提寺座落、印石寺座落、長城嶺座落	臺麓寺行宮	三箭山、龍泉關（出關即山西界）

資料來源：《嘉慶朝起居注冊》、《西巡盛典》，卷 13。

表四 嘉慶十六年五臺山拜廟日程一覽表

月日	寺院	駐蹕地	備註
閏 3.1	白雲寺	白雲寺行宮	
閏 3.2	鎮海寺、殊像寺、菩薩頂	菩薩頂行宮	
閏 3.3			
閏 3.4	大螺頂、金剛窟、普樂院		
閏 3.5	羅睺寺、顯通寺、塔院寺		
閏 3.6	壽寧寺、玉華池		
閏 3.7		白雲寺行宮	是日自五臺山回鑾
閏 3.8		臺麓寺行宮	

資料來源：《五臺圖檔》、《嘉慶朝起居注冊》、《清實錄》。

表五 嘉慶十六年西巡回鑾日程一覽表

月日	站次	是日起點	中伏處	駐蹕地	重點景觀
閏 3.9	1	臺麓寺行宮、長城嶺座落	印石寺座落、招提寺座落	大教場行宮	墨黑駝山、北流河、掛甲樹
閏 3.10	2	大教場行宮	靈應庵尖營	法華村大營	派河、胭脂河
閏 3.11	3	法華村大營	普佑寺座落、張家莊東尖營	王快鎮大營	五峰嶺、鹿駝山、水簾洞
閏 3.12	4	王快鎮大營	麗家莊尖營、東石屏尖營	楊家莊大營	箕山
閏 3.13	5	楊家莊大營	南同村尖營、北色村尖營	樺皮村尖營	郇河、木刀溝
閏 3.14	6	樺皮村尖營	北孫村尖營	隆興寺行宮（正定府）	滹沱河、廣惠寺
閏 3.15			崇因寺座落（定正府）		
閏 3.16	7	隆興寺行宮	塔兒屯尖營、新城鋪尖營	彭村大營	滋河、義臺城
閏 3.17	8	彭村大營	郭村尖營、康莊尖營	眾春園行宮	中山靖王宮、陋室
閏 3.18	9	眾春園行宮	清風店尖營、七里鋪尖營	膏腴鋪大營	唐河、堯母陵、堯帝廟
閏 3.19	10	膏腴鋪大營	涇陽驛尖營、高莊尖營、大慈閣座落（保定府）	靈雨寺行宮（內有臨漪亭尖營）	金線河、方順河、候河、滹河
閏 3.20			蓮花池座落（保定府）		
閏 3.21	11	靈雨寺行宮	常樂村尖營、茂山衛尖營	新莊大營	靈雨祠
閏 3.22	12	新莊大營	王家莊尖營、藍溝村大營	紫泉行宮	巨馬河、白溝河、紫泉河
閏 3.23	13	紫泉行宮	三家店尖營	藥王廟行宮（涿州）	樓桑村、督亢亭
閏 3.24	14	藥王廟行宮	常店村尖營、宏恩寺座落	黃新莊行宮	湖梁河、挾活河、福聚寺、琉璃河
閏 3.25	15	黃新莊行宮	趙新店尖營、夏莊尖營	圓明園	石景山、西山、拱極城

資料來源：《嘉慶朝起居注冊》、《西巡盛典》，卷 16。

資料說明：關於第一站起行地點，據《西巡盛典》卷 16，圖說注明「長城嶺座落」，唯考慮是日起點應自前一日駐蹕地點，故補入臺麓寺行宮。

表六 《五臺圍檔·嘉慶十六年》目次一覽表

	月日	事由	語文	頁次	備註
1		軍機處此次扈從滿漢章京職名開列於後應給各項分數各該管部院依例發給	滿文	125-126	
2		滿漢章京職名清單	漢文	123	
3		恭查乾隆六次巡幸五臺加恩賞費及應行各事宜單	漢文	115-121	嘉道/16/80
4	2月25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據乾隆十一年扈從五臺山官員兵丁等於起行前一月特旨賞賜為此繕寫清單進呈	滿文	113-114	
5	2月25日	奉上諭扈從官員侍衛等應於俸銀內坐扣者著展限一季護軍校、護軍、拜唐阿、兵丁等各賞一個月錢糧	滿文	112	
			漢文	111	
6	3月1日	軍機處行兵部咨文所有軍機處載滿漢緊要檔案需車五輛應用馬匹十四匹交兵部備辦仍照去年所辦得票備用	漢文	109	3月18日起鑒
			滿文	107-108	
7		軍機處行戶部咨文本處扈從滿漢章京十七人應領野外盤費銀出具印文領取屬實	滿文	106	
8		軍機處行戶部咨文本處扈從滿漢章京十七人所需野外盤費銀兩照例發放	滿文	103-104	
9		遵旨擬賞章嘉呼圖克圖等物件清單	漢文	97-101	
10	3月30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本日皇上至招提等寺燃香依高宗純皇帝例賞賜	滿文	95-96	
11		賞招提寺、印石寺、湧泉寺、臺麓寺清單	漢文	93	
12	3月30日	奉上諭此次扈從二百名執事人員著賞給錢糧一月	滿文	92	
13	閏3月1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本日皇上至白雲寺燃香依例賞賜	漢文	90	進入五臺山區，是日駐蹕白雲寺行宮
14		賞白雲寺清單	漢文	87	
15	閏3月2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本日皇上至鎮海等寺燃香依例賞賜	滿文	86	
16		賞鎮海寺、殊像寺、菩薩頂清單	漢文	83-84	
17	閏3月2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遵旨辦理此次扈從王大臣等賞賜漢字清單繕寫敬呈等事	滿文	80-82	殊批：已另行添賞
18		擬賞山西辦差大臣官員緞疋等物單	漢文	75-77	閏3月初5在臺懷賞訖
19		擬賞山西鹽商八員物件清單	漢文	73	
20		擬賞扈從王大臣、侍衛、官員等名單	漢文	65-72	盛典/9/褒賞/19
21		擬閏三月十一日賞留住王快王大臣等名單	漢文	63-64	閏3月11日在王快賞
22		擬閏三月十四於正定府賞直隸辦差大臣官員等緞疋等物單	漢文	59-61	閏3月14日在正定府賞
23		擬賞湖北巡撫錢楷物單	漢文	57	
24		遵旨擬賞隨從各項侍衛章京物件單	漢文	55-56	
25	閏3月3日	照山西布政使張映漢之例賞四川布政使方積小卷寧綢二件小卷八絲緞二件官用緞二疋，此特旨賞	漢文	53	
26	閏3月3日	奉上諭原訂山西巡撫備馬二千匹除六百匹交上駟院供換乘外其餘著巡撫領回等事	滿文	51-52	盛典/3/恩綸/10

27	閏3月4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本日皇上至大螺頂等寺燃香依例賞賜進呈漢字清單	滿文	50	
28		賞大螺頂、金剛窟、普樂院清單	漢文	47	
29	閏3月4日	上諭噶勒丹呼圖克圖章嘉呼圖克圖及所領各寺喇嘛於菩薩頂誦經三日著賞銀五千兩由儲山西之塩商人等所交十萬兩銀項下動支	滿文	45-46	盛典/9/褒賞/25。 原文誤做陝西
30	閏3月5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本日皇上至羅睺等寺燃香依例賞賜進呈漢字清單	滿文	44	硃批：著顯通寺添賞銀十兩
31		賞賜塔院寺清單	漢文	42	
32		賞賜羅睺寺清單、賞賜顯通寺清單	漢文	41	
33	閏3月6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本日皇上至壽寧等寺燃香依例賞賜進呈漢字清單	滿文	40	閏3月7日回鑾
34		壽寧寺、玉華池賞賜清單	漢文	37	
35	閏3月8日	代奏遵旨會同拉旺多爾濟向蒙古王公噶勒藏棟羅布等六人傳述令在大教場即由易州各回遊牧	漢文	35-36	嘉道/16/139
36	閏3月18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本日皇上至隆興寺燃香依例賞賜進呈漢字清單	滿文	34	
37		賞賜隆興寺、崇因寺清單	漢文	31	
38	閏3月14日	遵旨繕寫擬賞貢紗清單恭呈御覽所餘交廣儲司存貯。奉旨所餘之貢紗袍褂料三套香珠二匣著分賞軍機章京欽此	漢文	29	奉硃批
39		擬賞王大臣侍衛等貢紗等物單	漢文	23-27	
40		擬賞正定操演官兵緞疋銀牌等物單	漢文	21-22	
41	閏3月16日	大學士慶等謹奏正定鎮總兵九十重覆開送應賞藤牌兵銀牌六十面請交部察議	漢文	19	嘉道/16/153
42	閏3月19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依乾隆五十七年賞賜保定府滿洲兵丁半月錢糧恭擬上諭呈閱後頒發	滿文	17-18	
43	閏3月19日	上諭直隸沿途當差綠營各兵丁已賞給一個月錢糧駐保定府滿洲兵丁雖無扈從當差亦賞半月錢糧	滿文	16	
44	閏3月19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本日皇上至靈雨寺燃香依例賞賜進呈漢字清單	滿文	14	
45	閏3月19日	奉上諭賞賜扈從校尉二百名每名銀一兩由廣儲司動支	滿文	10	
46	閏3月20日	大學士慶桂等奏本日皇上至大慈閣燃香依例賞賜進呈漢字清單	滿文	8	上奏日期
47		賞賜大慈閣清單	漢文	5	
48		遵照乾隆十一年之例擬賞保定駐防操演官	漢文	3	
49	閏3月20日	擬賞直隸總督操演官兵緞疋銀牌等物單	漢文	1	盛典/5/閱武/4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資料說明：1. 頁碼為後人所編，然據該檔冊原裝訂形式，閱讀順序與頁碼順序相反。2. 空白頁不列入本表頁次。3. 序號6為滿漢合璧咨文，視為一件。4. 備註欄內注明參照史料，「嘉道」為《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盛典」為《西巡盛典》。

表七 乾隆十一年西巡恩賚一覽表

佛寺	恩賚	分類	備註	
菩薩頂	御書心經佛塔，墨刻心經佛塔、水月觀音、童子觀音，墨刻金剛經佛塔	佛經、觀音像	供 於 佛 座 前	
	供奉鍍金寶塔、鍍金菱花盤、彩漆挑桿八吉祥琺瑯、把盞花瓶、荷葉碗、黃羅寶蓋	物件		賞賜喇嘛
	供奉鍍金八寶滿達			
	食品			
	蟒袍、蟒緞、念珠、貂皮			
	格隆等蟒袍十七件			
	椰珠一百八盤			
	製帛二百二十方			
	眾僧銀五百三十餘兩			
臺麓寺	御書心經佛塔，墨刻心經佛塔、水月觀音、童子觀音、墨刻金剛經佛塔	佛經、觀音像	佛座前	
	蟒袍、緞疋	物件	喇嘛	
	眾僧蟒袍六件			
羅睺寺	住持格隆等蟒袍六件			
玉花池、般若寺	墨刻心經佛塔，水月觀音、童子觀音各一卷	佛經、觀音像	佛座前	
壽寧寺、鎮海寺、七佛寺	住持等蟒袍各一件	物件		
法祥寺、三泉寺	墨刻心經佛塔，水月觀音、童子觀音各一卷	佛經、觀音像	佛座前	
各寺	佈施銀五百九十五兩	佈施銀		
殊像寺	帑金一千兩修繕	修繕帑金		
五臺縣	蠲免五臺縣錢糧十分之三	免稅		

資料來源：《欽定清涼山志》，卷7，巡典，恩賚附，頁5a-6a。

表八 乾隆年間供奉佛經、佛像情形一覽表

年代	寺廟	供奉佛經	供奉佛像	備註
乾隆26年2月	菩薩頂	御書心經佛塔一軸	滲金文殊菩薩、孺童文殊菩薩像二尊	
乾隆46年2月	菩薩頂、臺麓寺、普樂院、湧泉寺	御書千手千眼佛經各一分、妙法蓮華經各一分、金剛經塔各一分、心境圖各一分	七佛像各一分	
	殊像寺、塔院寺、鎮海寺、白雲寺、妙法寺、玉華池	御書千手千眼佛經各一分	七佛像各一分	
	羅睺寺、顯通寺、碧山寺、金剛窟、金燈寺	妙法蓮花經各一分	七佛像各一分	
	棲賢寺、千佛洞、壽寧寺		七佛像各一分	

	普安寺、南山寺、大螺頂、羅漢坪、宏慶寺、古清涼寺、明月池、廣宗寺	妙法蓮花經各一分		供奉各寺藏香五十束
乾隆 51 年 2 月	菩薩頂	妙法蓮華經二部、大悲陀羅尼經二部	七佛像二分	福字三方
	臺麓寺、白雲寺、鎮海寺、玉華池、普樂院、金剛窟、明月池、大螺頂、壽寧寺、羅睺寺、顯通寺、塔院寺、殊像寺	妙法蓮華經各一部、大悲陀羅尼經各一部	七佛像各一分	福字各二方
	五臺各廟	文殊菩薩經八分		
	菩薩頂、臺麓寺各廟			藏香三十四束、香餅七匣、四色香二十四匣
乾隆 57 年 3 月	菩薩頂真容院	藏經一部	青玉石無量壽佛、青金石無量壽佛、鍍金無量壽佛、青玉石文殊菩薩各一尊	手卷一軸、鍍金鼎爐一座、珍珠幃、珊瑚香筒、鍍金燭臺、鍍金花瓶各一瓶、鍍金珖瑯七珍、鍍金珖瑯八寶各一副
	菩薩頂	四體文殊師利贊（磁青紙泥金字經一部）		
	五臺山各寺廟	四體文殊師利贊（尋常刷裱一百分）		
乾隆 59 年	臺麓寺		古銅佛九尊、玉石采巴佛、玉石文殊菩薩並獅子各一尊、鍍金供器、鍍金八寶各一副	
	羅睺寺		鍍金無量壽佛一尊	
	七佛寺	妙法蓮花經七卷	七寶佛七軸	
	普樂院	大聖文殊菩薩四樣字經三部		
	顯通寺		玉佛一尊	珖瑯供器、鍍金供器各五件，珖瑯七珍、八寶瓶盞供器十七件
	殊像寺			古銅鼎供二堂十件
	白雲寺		瑪瑙佛三尊、文殊菩薩一尊	洋磁七珍、八寶供器二堂三十件，珖瑯五供二堂十件

資料來源：《欽定清涼山志》（乾隆），卷 7，巡典，恩賚附，頁 6b-10a；《欽定清涼山志》（嘉慶），卷 7，巡典，恩賚附，頁 11a-12b；《活計檔》，乾隆五十七年四月，記事錄，Box No. 151 p.523-525。

資料說明：1. 賞賜有緞疋、荷包、製帛、銀兩等非宗教用器，本表限於篇幅未予列入；2. 乾隆五十七年，西巡所頒物件尚有《活計檔》所載四體《文殊師利贊》，乃清高宗於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離開五臺山區後頒旨製作。3. 乾隆五十九年，雖未舉行西巡，然此次頒賞甚具規模，可資比較。

表九 清仁宗巡幸五臺山頒供各物件一覽表

寺廟	佛像	數珠	洋磁物件	木供	哈達	其他
菩薩頂	古銅無量壽佛一尊	噶不喇數珠一掛	洋磁大供碗九件、小供碗九件、供盤九件、供器五件			玉蓮花一件、玉珍供器七件、玉寶供器八件。
壽寧寺			洋磁大供碗九件、小供碗九件、供盤九件、供器五件、供盤九件、供器五件			
顯通寺		數珠三掛		十五件	三個	珍珠一粒隨同錢一文
塔院寺				五件	三個	
黛螺頂	長壽佛一尊		洋磁供器五件、供盤九件、供碗九件、供盤九件			
殊像寺	長壽佛一尊、鍍金文殊菩薩一尊	珊瑚念珠一盤	洋磁供器五件、供碗九件、供盤九件、供盤九件	洋漆木供五件	一個	
白雲寺			洋磁供器五件、供碗九件、供盤九件、供盤九件	瑤瑯木供五件	三個	番字經一卷

資料來源：《西巡盛典》，卷4，秩祀，頁3a-4b。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土觀胡圖克圖·洛桑卻吉尼瑪，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 (清)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魯盛典》四十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652，1983。
- (清)王軒等修，《山西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和珅等奉敕修，《欽定大清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74-483，1983。
- (清)松筠，《衛藏通志》，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 (清)納塔，喬吉校注，《金鬢》，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 (清)崑岡等修，《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重修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冊 795-797，1997。
- (清)清仁宗，《味餘書室全集定本》，海口：海南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冊 579，2001。
- (清)清高宗敕修，《欽定清涼山志》，海口：海南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冊 248，2001。
- 包文漢整理，《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
- 包文漢、陶繼波整理，《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二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8。
- (清)理藩院修，楊選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 41 編，1985。
- (清)喇嘛老藏丹巴，《清涼山新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漢、滿、蒙、藏文本，清武英殿刊本。
- (清)董誥、彭齡等輯，《西巡盛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 (清)趙翼，《簞曝雜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 《大清仁宗睿皇帝滿文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中國古代當鋪鑒定祕籍（清鈔本）》，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
- 《五臺圍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軍機處檔摺件》（奏摺副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宮中檔嘉慶朝硃批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所藏）》，北京：中華書局，2009。
-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所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 《清史稿校注》，臺北：國史館，1986。
-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中心，2003。
- 《欽定清涼山志》，二十二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嘉慶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 《欽定清涼山志》，二十二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內府朱絲欄寫本
- 《欽定續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咸豐九年敕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冊 473，1997。
- 《嘉慶朝起居注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漢、滿文本。
- 《滿文本清聖祖起居注稿》，明清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活計檔）。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謝小華選編，〈乾嘉年間五臺山寺廟行宮修繕工程史料（上）（下）〉，《歷史檔案》，83-84(2001.3-4)。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國古代當鋪鑒定祕籍（清鈔本）》，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

二、近人論著

- 王俊中，《五世達賴教政權力的崛起》，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1。
- 包文漢、喬吉編著，《蒙文歷史文獻概述》，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 朱誠如，〈論嘉慶親政後中央權力的重組〉，《明清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第三輯，頁 257-267。
- 朱誠如、張玉芬主編，《清朝通史·嘉慶朝》，冊 10，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 妙舟法師，《蒙藏佛教史》，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
- 肖雨，〈嘉慶皇帝與五臺山〉，《五臺山研究》（1995：1），頁 24-25。
- 馬連龍，〈三世章嘉國師駐錫五臺山事略〉，《五臺山研究》，20（1989：3），頁 35-38。
- 崔正森，《五臺山佛教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 陳捷先，《順治寫真》，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
- 蕭寧，〈章嘉呼圖克圖與五臺山佛教〉，《五臺山研究》，25（1990：4），頁 11-15。
- 魏斐德，《洪業》，臺北：時英出版社，2003。
- 關文發，《嘉慶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 Chang, Michael.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Making Tibet inside the Frontier: On the Last Western Tour to Wutai Mountain of Emperor Jiaqing

Lin Shih-hsua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Abstract

Imperial tour was the great important official activit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 the time of Kangxi and Qianlong reigns, they frequently went north to the Mountain Resort in Chengde, and raised the hunting trips, besides there were the eastern tour (Mukden), southern tour (Jiangnan), and western tour (Wutai Mountain), these imperial tours continued until the early 19th century. By preparing these imperial tours, the emperors could patrol and observe the public sentiment, custom. In the same time, excellent literary, outstanding armed strength was advocated and rewarded. The emperors want to unfold the Manchu imperial authority, simultaneously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aped models of Qing Dynasty's unique disposition.

Shanxi's Wutai Mountain is located near the Great Wall, where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Mongolian and Chinese people. There were coexisting the Chinese and the Tibetan Buddhism, especially attracted the Mongolian to go to worship. Visited by the Qing emperors did push its historical status to the peak. "Making Tibet inside the frontier" was that the definition of Wutai Mountain by Emperor Jiaqing. After Emperor Jiaqing ascended to the throne, the Great Qing entered the "post-Qianlong time". Emperor Jiaqing followed the regulation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Qianlong time, imperial touring was one of the tradition except southern tour.

Emperor Jiaqing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raise western tour in 1811. He prepared discretely for many years, however besides pecuniary embarrassment, as a result of the cognitive disparity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bureaucrat, his western tour differed from the previous, and the Qing had not conducted again.

This study is about the Qing's last western tour based on analyzing some archives, rare books holding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specially the archives of "Wutai Wei Dang". The "Grand Secretariat Archives"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is very useful. I also deliberate the “Western tour magnificent ceremony” of Jiaqing imperial edition to analyze its whole story, and demonstrate the religious factor was the special function.

Keyword: Qing dynasty, Qing Renzong, Wutai Mountain, Western imperial tour (Xixun), Emperor Jiaqing, Emperor Qianlong, Manc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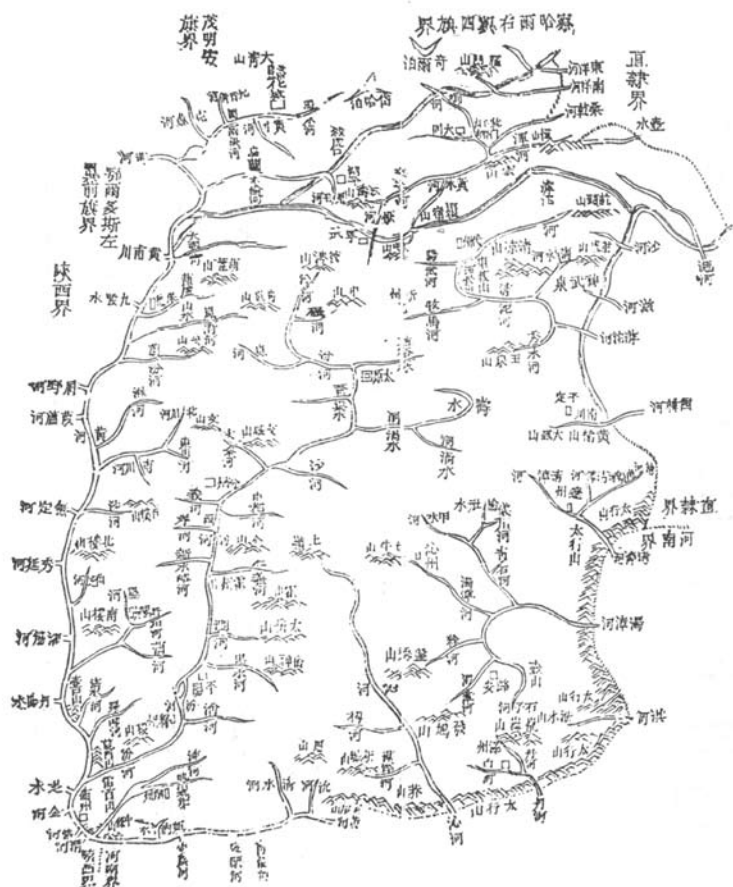


圖1 山西省全圖 欽定大清會典圖 卷一六四 輿地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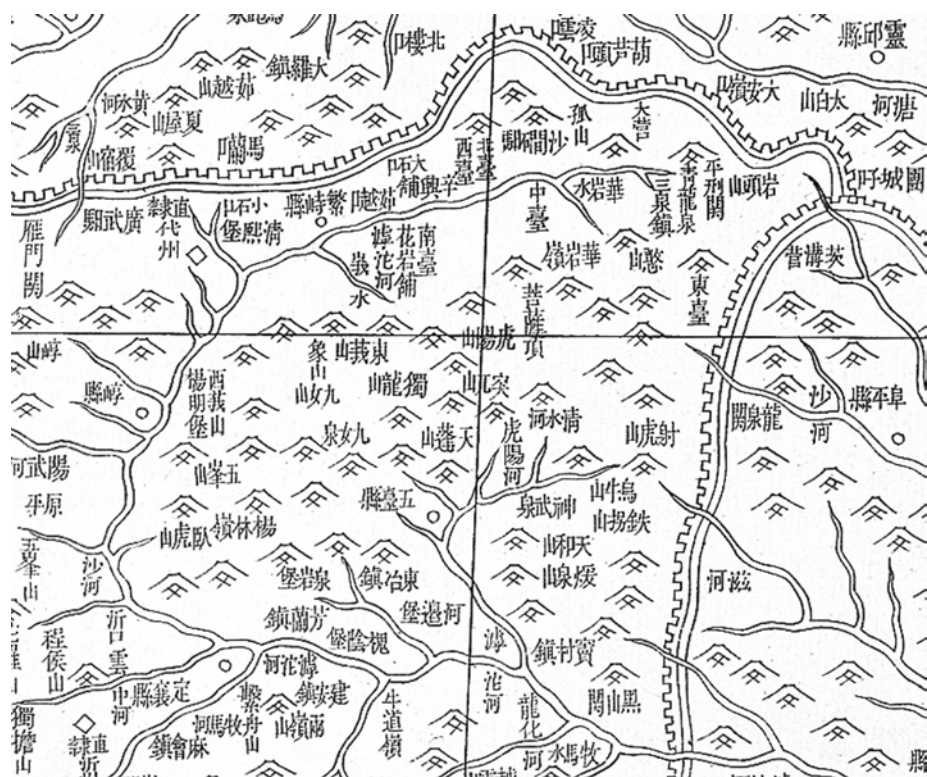


圖2 五臺山周邊圖 重印乾隆內府輿圖(順天府、太原府)

皇帝駐蹕大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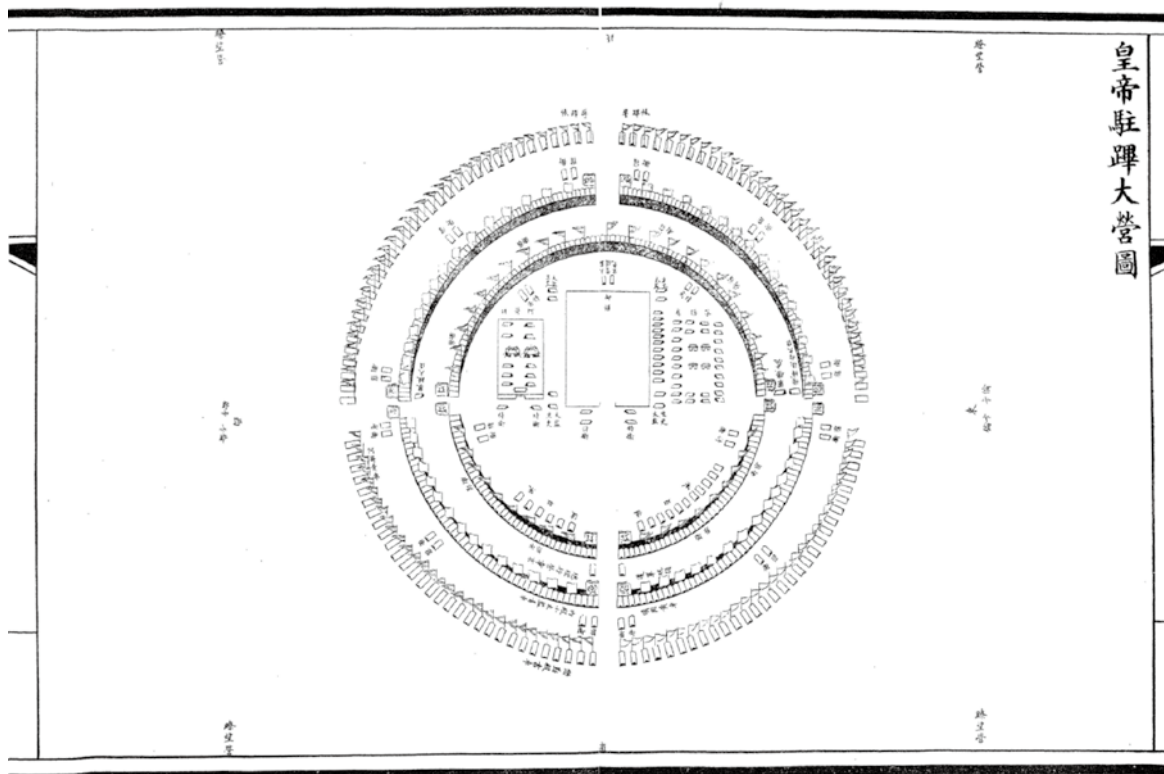


圖5 皇帝駐蹕大營圖 欽定大清會典圖 卷一百四 武備十四 幄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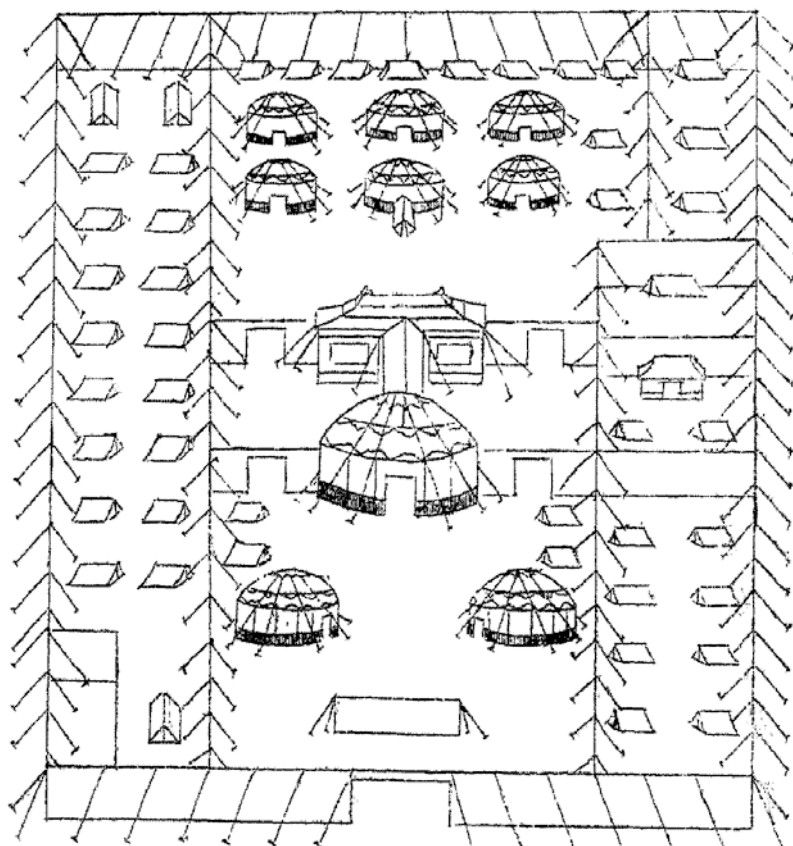


圖6 皇帝駐蹕御幄圖 欽定大清會典圖 卷一百四 武備十四 幄纛一

第一站
 圓明園至黃新莊行宮
 行程二十二里
 行宮十處
 共五十八里
 第一站
 圓明園至黃新莊行宮
 行程二十二里
 行宮十處
 共五十八里
 第一站
 圓明園至黃新莊行宮
 行程二十二里
 行宮十處
 共五十八里

圖7 內閣大庫檔案 移會 抄錄清字原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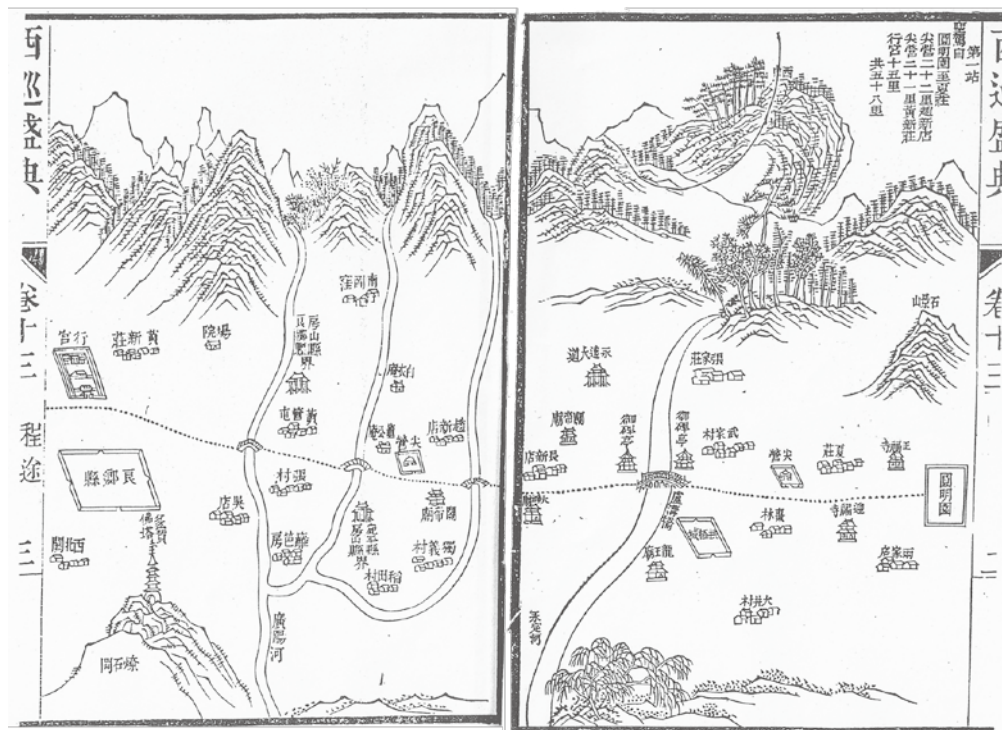


圖8 起行第一站 圓明園至黃新莊行宮 西巡盛典 卷十三 頁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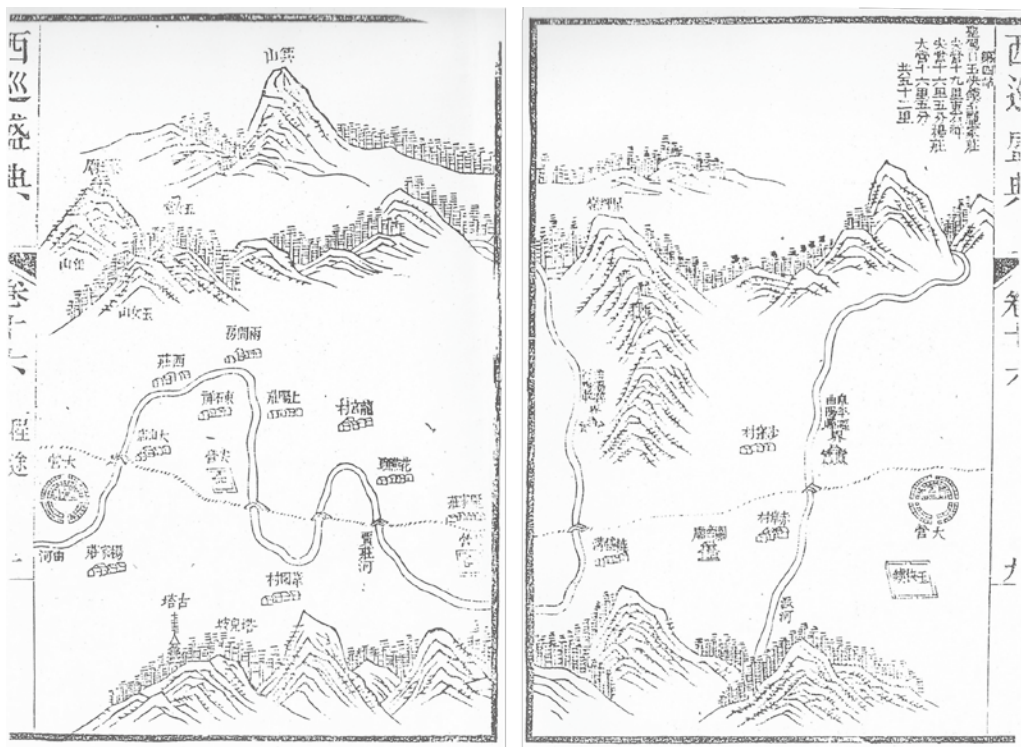


圖9 起行第四站 王快鎮至楊家莊大營 西巡盛典 卷十三 頁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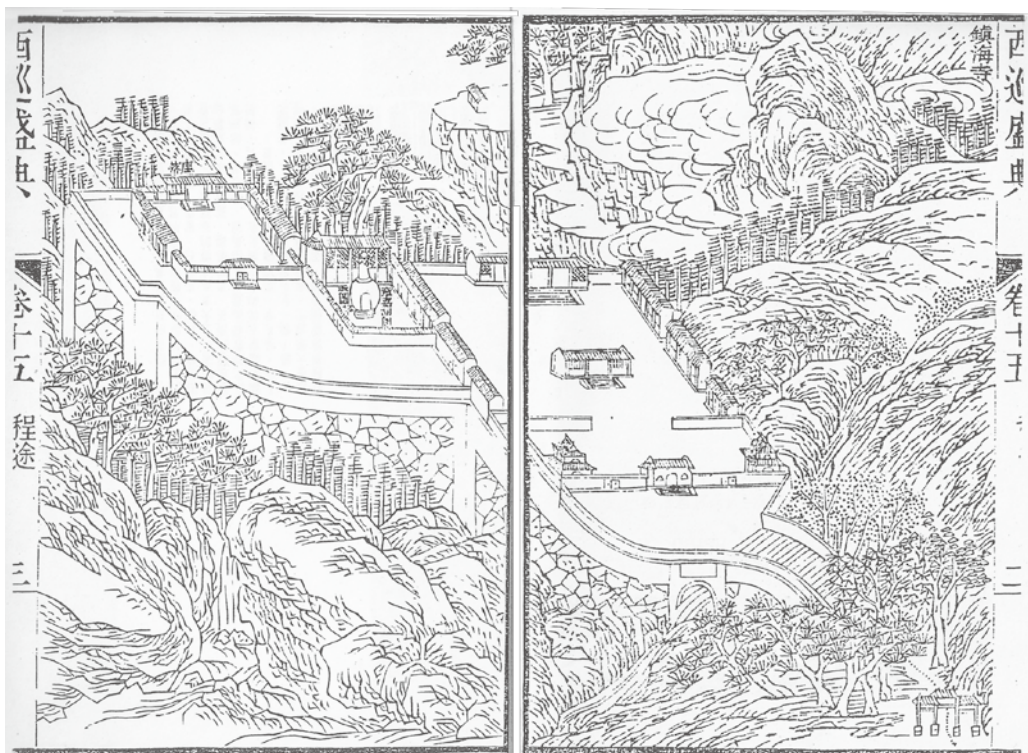


圖10 鎮海寺 章嘉呼圖克圖塔 西巡盛典 卷十五 頁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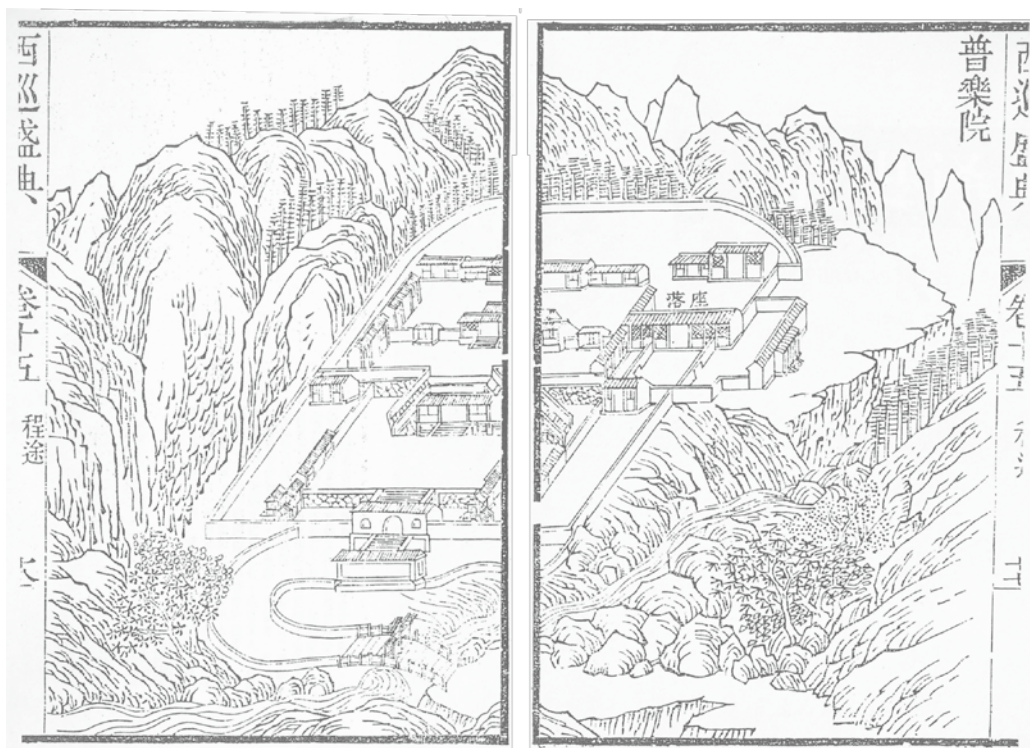


圖11 普樂院 西巡盛典 卷十五 頁1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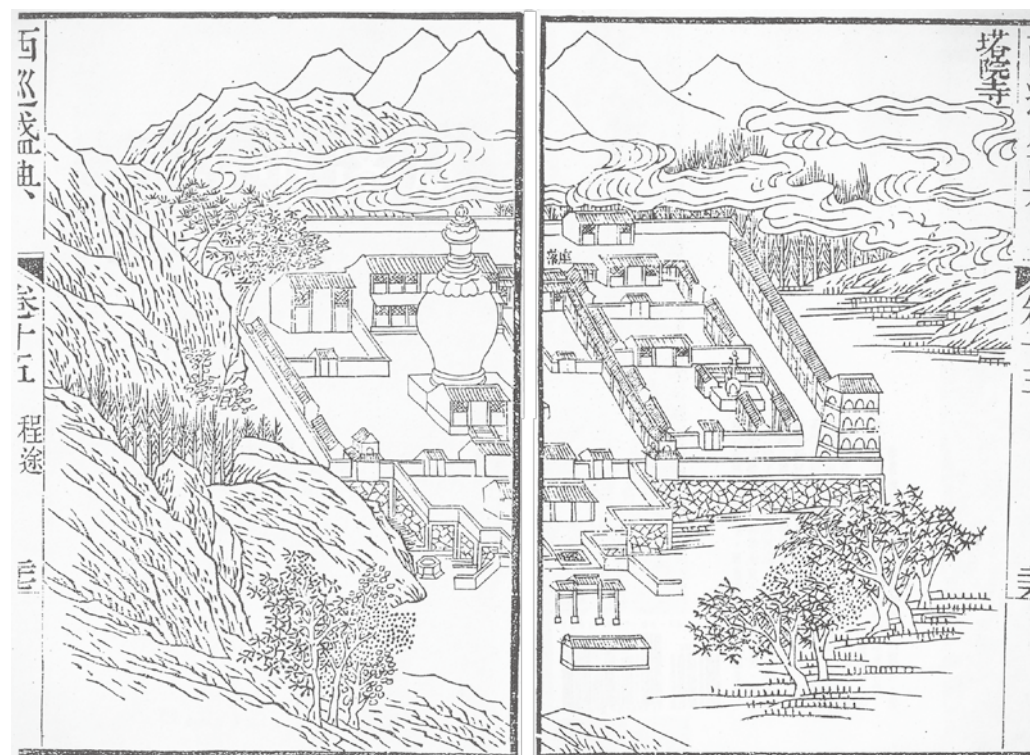


圖12 塔院寺 西巡盛典 卷十五 頁2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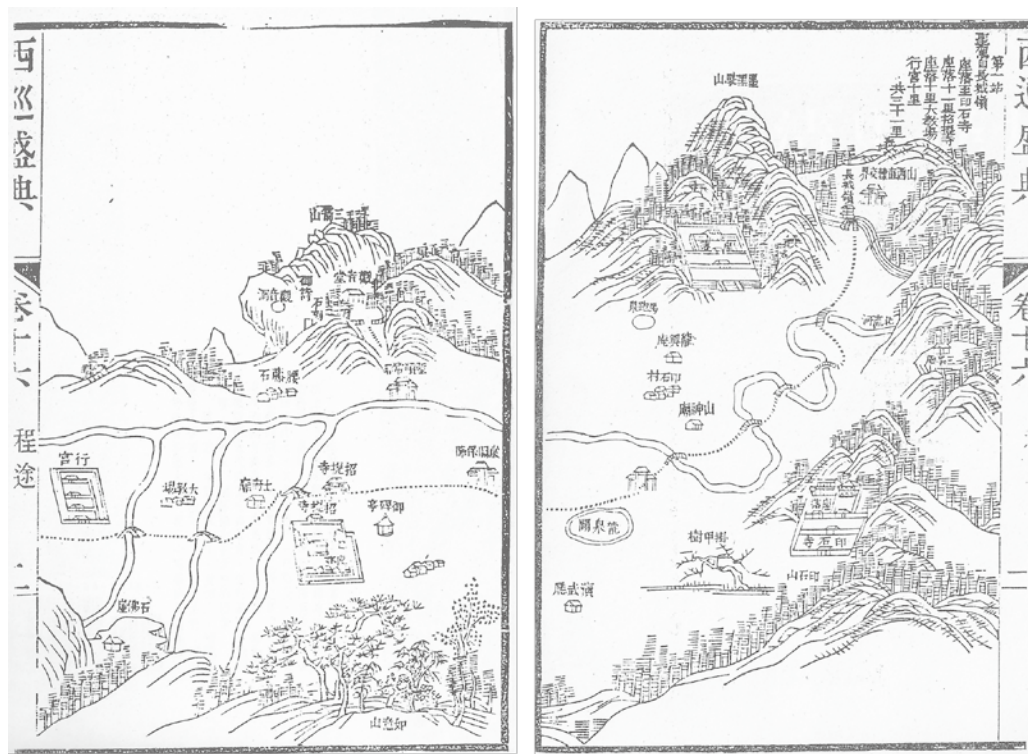


圖13 回鑾起行第一站 長城嶺至大教場行宮 西巡盛典 卷十六 頁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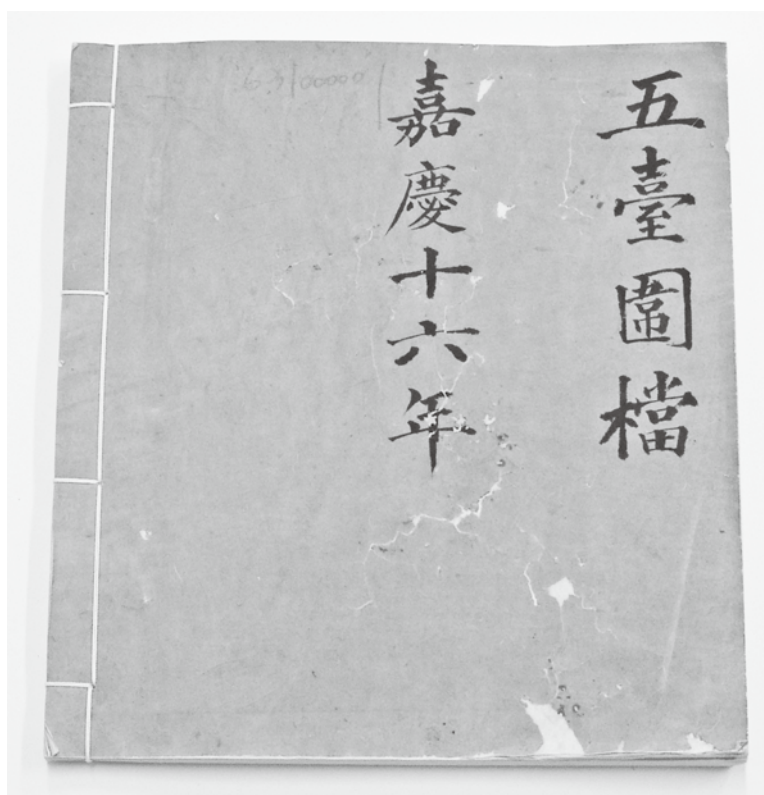


圖14-1 五臺園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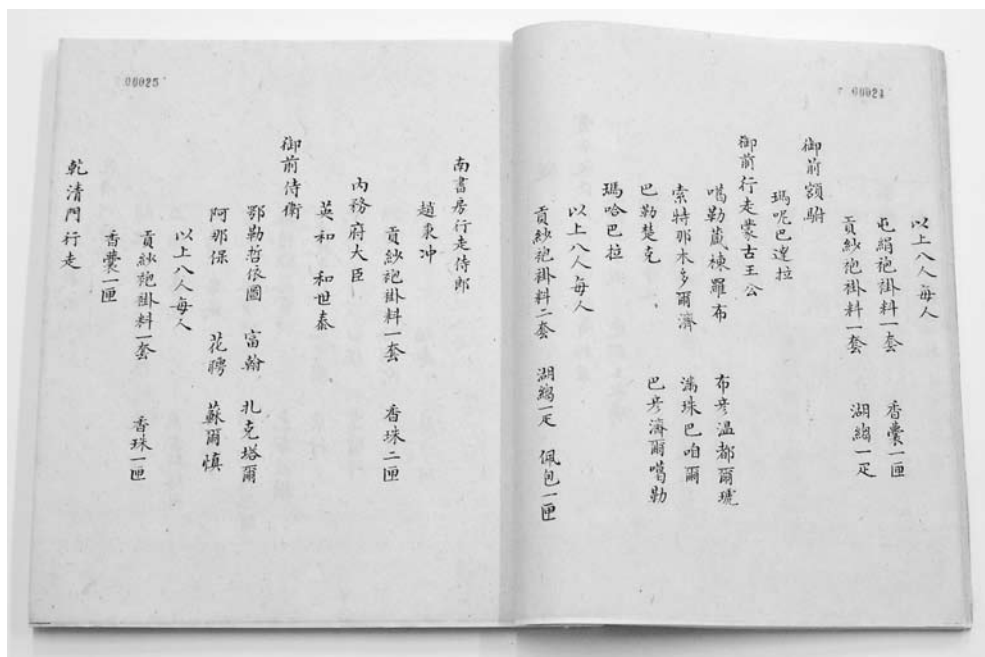


圖14-2 五臺圍檔 擬賞蒙古王公等物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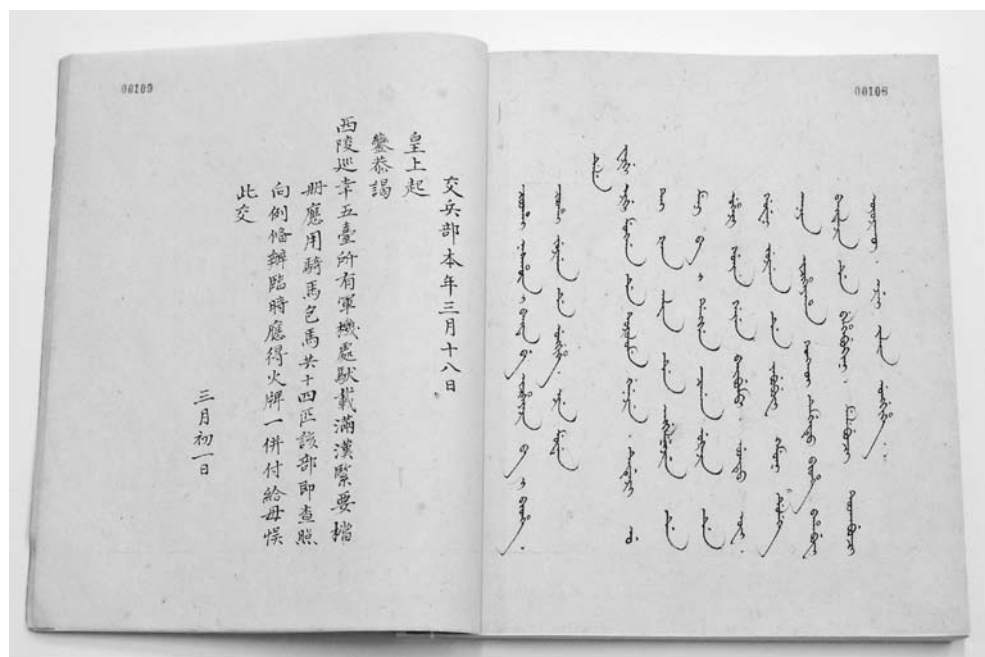


圖14-3 五臺圍檔 軍機處行兵部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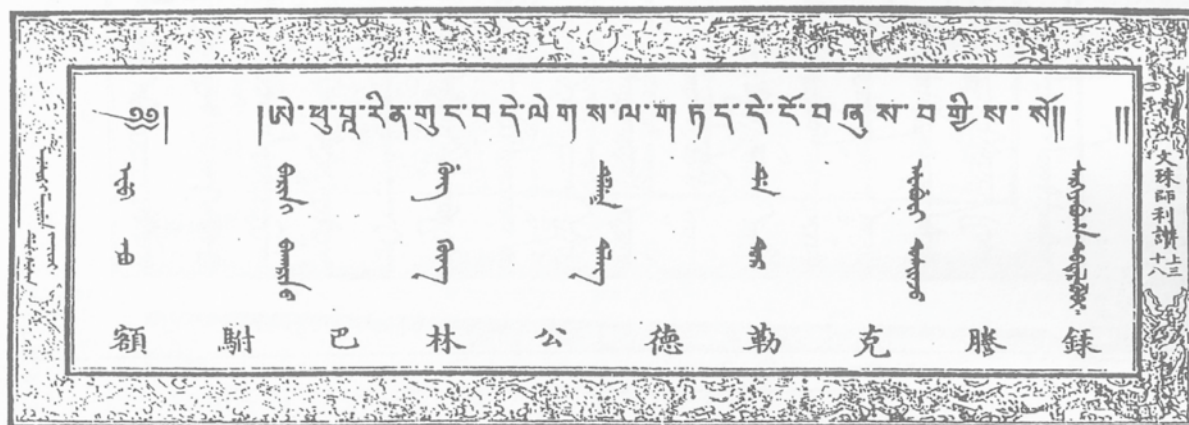


圖15 四體文殊師利贊 György Kara, *Books of the Mongolian Nomads*, Plate XXVII. Recto page of leaf 38 of a 1781 tetraglot Manchu imperial print and part of its colophon